译 者 的 话

在这个专集里，我们选译了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七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供了解和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参考。

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波兰一个外交官的家庭。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负责人。1961年初他是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顾问之一，1966年到1968年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成员。从1973年起，他是国际组织三边委员会的负责人。1976年12月，卡特任命他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本专集选译的文章和讲话，是按其主要内容编排的，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世界的三角：亚洲变动中的均势及其对大西洋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探索焦点》、《谈谈东西方关系》等三篇，主要阐述布热津斯基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总结构的观点。第二部分包括《美国对俄国提出新挑战》、《美国和欧洲》、《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和变动》、《某种国际结构内的和平》等四篇，主要阐述布热津斯基关于美苏关系、美欧关系、美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中东和南部非洲等的态度和政策。第三部分即《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美国》，这篇长文于1976年发表，着重从历史的思想的角度，阐述了布热津斯基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总结构的理论基础。

在本专集中，除第三、第四两篇选自新华社通讯稿外，其余都是我们译的。

1978年11月

目　录

一、世界的三角：亚洲变动中的均势及其对大西洋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本章基于两个前提，每个前提都将在后面更充分地加以申述：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冲突成为左右国际政治的第一大事和中心，这样的时代业已终结。

2．亚洲已经取代欧洲成为对国际秩序最具有潜在危险的冲突场所。

这两个前提又导致我们的重要的政策结论，这个结论也将在下述论证的过程中更充分地加以申述：

无论是促进国际稳定和亚洲的社会进步方面，都迫切需要鼓励正在形成的国际社会中最先进的部分即日本、西欧和美国之间进行审慎的政治协商——最后是实行政治合作。

当然，要十分准确地指出历史时代的起点和终点是极端困难的。历史象一条江河，是一个永远在变动而又持续不断的过程。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辨认划分国际事务诸阶段的一些历史分水岭，而国际事务是由看得出来的各种关系的某种模式所支配的。1947 年 5 月 22 日，由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项国会法案，使美国承担了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反对苏联的阴谋的义务，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分水岭。总统趁此机会声明，美国的目的是“支持自由人民反抗那通过武装的少数民族或外部压力而进行的蓄意的征服。”美苏对抗凌驾国际事务其他方面之上的战后

时代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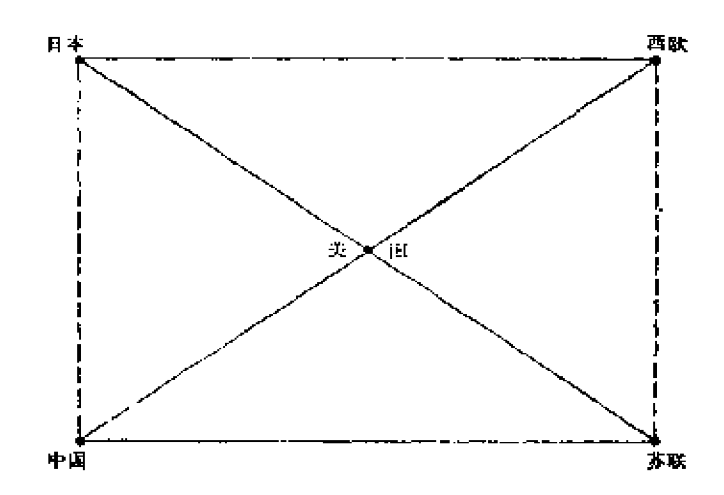
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标志了美国依靠新的和更加错综复杂的苏联—中国—美国这个三角的相互作用，作为抵消增长了的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尼克松接着访问莫斯科，则表明无论他还是他的苏联对手当时都准备调整他们的角逐关系，并以发展合作关系来平衡这种关系。这些新的关系应该兼具实用的性质（例如军备控制，科学协作，发展和贸易）和地区的性质（例如欧洲政治和安全会谈）。这两个敌对的大国发展这些关系的意愿，标志了以美苏角逐为中心的状态在逐渐消失。实际上，出于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的巧合，尼克松总统就在杜鲁门主义宣布二十五年后的日子抵达莫斯科，这又给他1972年5月22日所发表的"我们在我们可以使和平共处成为现实的时刻会晤"的那次声明增加了象征意义。

尽管在美苏关系上，角逐的方面非常可能仍将超过合作的方面，但业已成为事实的是，对它们每一方说来，现在所关切的其他事情已象早先它们正面对抗的情况一样显得突出。因此，美国仍将是苏联的主要对手，但是现在中国非常可能被俄国看作是最严重的潜在威胁的根源。苏联仍然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但建立同欧洲和日本的稳定和互利的关系，正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和美国经济界领导人物所全神贯注的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事情。

实际上，最近几年来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业已见到一种根本性的剧烈变革，美国和苏联意味深长地改变了它们关系的性质，美国和中国，美国和日本，日本和中国，苏联和西德，以及美国和西欧（在某些方面）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国际政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与两极性和两极敌对在意义上和性质上都不相同的阶段。

要使这种新阶段概念化，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它看作包括两个关键性的三角关系，每个三角都包含着由合作因素和角逐因素构成的多少有所不同的混合物。涉及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第一个三角，是以角逐为主的三角，虽然近来也已引进了合作的因素。这里主要的利害关系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而决定性的力量则仍然是军事方面的，虽然也涉及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军事力量上，美国和苏联都发觉自己是处于两极牵制的关系之中，而它们的政治关系则具有非常复杂的三角的相互作用。这里不断需要使角逐关系更加稳定，不那么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在核武器的性质已为众所周知的情况下。

涉及华盛顿、东京和布鲁塞尔（或欧洲）的另一个三角，基本上是合作的，尽管角逐的因素近来有所露头，而且在公众和政府的议论中很惹人注意。这里关键性的利害关系首先在经济方面，虽然政治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所涉及的力量主要是财政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则大体上没有，因为这三方在根本上都信奉民主政治那套做法。这里需要的显然是减少冲突的成分，以对共同政治命运的更深的认识来加强经济上相互依靠的现实，从而



使这个三角成为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基石。

如上图所示，这两个三角又伴有第二位的三角关系，这些第二位的三角关系，有的已经在形成，有的对国际事务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苏联总想促使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多少不那么密切，它的许多外交活动仍然企图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几乎无可怀疑的。同样，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和日本在对待台湾或朝鲜这样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上，可能加剧意见的冲突，从而引起华盛顿、东京和北京之间更加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十分可能的。

总之，这里我们认为，如果试图分析当前世界形势，无论是从较早时候的美苏冷战居首要地位的角度出发，还是如尼克松总统近来提出的从各主要单位之间的传统均势(在这种均势下，既没有永久的同盟，也没有永久的敌人)的角度出发，都不如通过使用上述两个三角以便于更好地洞察当前的世界现实。关于第一个重要前提，要说的就是这些。

对欧洲霸权的争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的延伸——迄今是一个平局。各方保住了那次战争中已获得的东西，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同它们的欧洲伙伴之间各自的种种关系都分别变得比较松弛些，复杂些。此外，双方的多边机构发展了，而且没有理由预期它们的作用会下降。最后，尽管双方有矛盾，却都仍然心照不宣地同意德国仍应被分割开来，因为德国人——至少是暂时——现今都正式默认这种现实。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将在国际上使欧洲的现状合法化。

亚洲的形势颇不相同。它更容易变动，更捉摸不定，更复杂。和两个德国不一样，朝鲜哪一方都不承认它的分裂状态，朝鲜人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还有分歧，却都希望重新统一。他们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怀有激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对任意分割他们国家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日本人则还必须找到自己对政治方向的辨别力，而且与欧洲国家相反，他们缺乏一个更大的机构去让他们正面地从政治上表达自己起更大作用的愿望。中国人在用一切可能表示他们担心苏联的干涉，同时，他们的国内稳定却因那些与政权继承问题有关的难以捉摸的情况而蒙上了阴影。台湾最后如何处理尚待解决，台湾海峡的冲突可能还要发生。东南亚的未来还不清楚，要最后解决痛苦的越南内战仍将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要流更多的血。印度这个已经成为南亚举足轻重的国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政治对手，虽然它内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弱点孕育着严重不稳定的种子。最后，苏联担心中国力量的较长远的影响，正通过促进同印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和通过小心翼翼地扶植日本人，积极地从外交方面进行努力来牵制中国，与此同时，力求削弱美国在东南亚和远东的势力。

因此，要谈亚洲的新的均势还为时过早。从实质上说，那里的形势是变动不定的，它的结局如何简直无从预言。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有关的一些国家——日本是显著的例外——为建立它们的军事力量所作的紧张的努力，支配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这种军事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国内政治上的副产品）有同有效的经济发展相矛盾的倾向，从而加剧了潜在的社会紧张状态，并且比较普遍地给某些亚洲国家带来了社会分裂的幽灵。

在亚洲这种难以捉摸的总局势中，有三个主要的威胁可能向国际秩序挑战：第一，加剧了的中苏冲突。第二，在亚洲的核扩散。第三，日本的作用的突然变化。

苏联目前所追求的宏大目标，是要在广阔的欧亚大陆获得占优势的政治地位——虽然不是统治地位。在西方，这意味着

处心积虑地促使西欧逐步中立化，同时利用"缓和"来补救苏联经济的弱点。在南方，这意味着巩固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并扩张它在印度的影响。在东方，意味着审慎地扶植日本，以及牵制和孤立中国，同时也许还在等待时机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进程。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苏分歧有可能平息下去。苏联领导人看来在指望这一点。尽管如此，现存的分歧已促使苏联和中国在中苏边境各自集结大量的武装力量，同时，边界双方的思想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则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争执。当前中国大部分的防务预算主要是为防止苏联的军事干涉作准备，这样说并不夸张。在苏联方面，常规部队的大量军事开支，必须包括苏联远东军在内，因为苏联地面部队唯一最庞大的集结是部署在远东的。这支部队已从几年前的将近三个师增加到现在的大约四十九个师。大量的迹象表明，苏联的战略部队业已部分地重新部署来对付中国。

即便没有发生可能导致一场严重战争的苏联的直接干涉，这样的部队集结也制造了紧张状态，卷入的任何一方内部如果出现严重的政治不稳定，这种紧张状态就可能变得十分危险。毛一旦逝世，进行间接干涉的诱惑性很可能就特别强烈，这种干涉可通过暗示的威胁，通过给宠信的夺权者以偷偷摸摸的支持，甚至通过经济上的收买，而这会使远东舞台更加动荡不定。

在亚洲，对切实可行的国际秩序的探索，可能由于已经提及的另两个潜在威胁而在未来几年中进一步复杂化：核扩散的可能性以及围绕着日本的国际作用正在崭露头角所产生的难以捉摸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印度和日本都是亚洲潜在的核国家，虽然在政治上事先作好安排以便获得核武器，同获得核武器所需的实际的技术能力和财政能力之间如何配合，在这两个国家还是很不相同的。

印度同巴基斯坦作战取得了胜利，激发了新德里的自我陶醉的大国意识，而那些在业务上同对外事务和安全事务关系最密切的印度集团，并不隐讳它们要求印度成为一个核国家的愿望。印度虽然贫穷落后，但要求这样做的决心，却几乎肯定将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印度人自以为是中国人在亚洲的主要对手，许多印度人（还有日本人）沮丧地议论只有核国家才在联合国里享有特殊地位这个事实。

印度人懂得，要获得核武器的任何公开决定，不仅会使它同美国的关系、而且甚至可能会使它同苏联的关系复杂起来，还很可能对那些从事援助印度经济发展的国际机构和国家发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他们至今还在犹豫不决。此外，印度尽管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设备，但要很快地发展有效的发射系统，它的能力却是很值得怀疑的。

日本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在那里，迅速获得有成效的核威慑力量所需要的经济手段和技术设备都确实是现成的。现在还缺乏的是政治上的要求，尽管在范围较窄的防务专家和某些少壮的保守派政治家中有赞成的倾向。日本这个国家可能因搞核武器而陷于严重分裂，而它的决策人物敏锐地感到，任何这样的决定都将对日本同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日本人当前的倾向是反对获得核武器。

美国万一轻率地从远东脱身，这种形势便可能发生变化，而印度如果决心搞核武器，形势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将因又出现一个核国家，特别是一个亚洲的核国家而被刺痛，同时，日本也将因出现一个显然对它的邻国（即中国）敌视的核国家所造成的难以捉摸的情况而更加不安全。如果印度由于决心搞核武器而博得国际上一些特殊的重视，事情甚至还要更糟。然而，对日本说来，更加不安的，甚至更加可能激发日本

摘核武器的，大概还是日美关于安全事务的争执，如果这些争执加速美国摆脱当前在远东所承担的安全责任，情况将会尤其如此。

日本人本身出于无心也可能会引起这类争执。目前日本政治发展的势头趋向于逐步削弱美日安全协定的效力，最后留下美国单独对付台湾和南朝鲜问题，虽然它还要承担保卫日本本岛的义务。在未来的岁月中，美日关系大概将依然为经济上的紧张关系所拖累，鉴于这种可能性，美国公众似乎未必会准备承担单方面的安全义务。于是美日对安全问题的争执，就可能激发日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其他办法来谋求安全和世界地位。

在亚洲当前变动不定的国际局势下的核扩散，不可避免地将加剧国际紧张状态。由于现时的三角结构，一个拥有核的印度——更不用说那可能性很少的、一个拥有核的日本的前景——将比早些时候拥有核的英国和法国给国际舞台带来更多不安定的影响。不管法国和英国的领袖会怎么想，在两极集团相对抗的时代里，这两个国家的核力量基本上都是美国核力量的附属品。因此，它们对国际上不稳定的影响，都不如印度或日本将拥有核力量的影响那么大，而鉴于中印对抗和这两个国家近来武装冲突的历史，情况更是这样。

亚洲对国际和平的一些重大威胁

1．中苏战争——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严重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2．印度的核发展——一个武断的政策——同中国加剧了的紧张关系——内部虚弱的无法预言的后果。

3．台湾海峡——台湾的不安全或者政治激变——在台

湾——美国——日本有争执的海峡的武装冲突。

4. 朝鲜的统一——争取统一的强烈冲动，因为目前重新联系似乎不大可能很快地导致重新统一——随着美国军事势力的削减，越来越想单方面解决问题。

5. 日本的军事发展——内部的挫折和极化——同美国加剧了的紧张关系——同邻国的争执和亚洲普遍的忧虑。

远东第三个国际上主要的捉摸不定的情况——与以上讨论的那些捉摸不定的情况密切相关——是有关日本的政治作用问题。日本在经济上简直是太强大，在社会发展上太先进，在潜力上也简直是太大了，单纯地把它派充一个亚洲地区性的角色是不合适的，它在那里是无可匹敌的。它需要更广阔的建设性的出路。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对于这个精力极其旺盛、工业先进、局限在远离其他先进的工业社会的三个相当小的岛屿上的民族来说，也是政治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要求。中国在文化上特殊的吸引力，使日本越出亚洲范围而发挥更大作用的需求复杂化起来，这就助长了日本人的充满矛盾的心情，特别是当它已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美国卵翼下崭露头角的今天，情况就尤其如此。

就其他亚洲国家而言，它们对日本类似的矛盾的态度，使得给日本的国际作用下个定义更加困难了。一方面，它们想要日本从经济上参与自己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日本的政治优势，对日本的实际势力感到不满。泰国最近反对日本的抵制运动便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结果。这就进一步妨碍着日本在亚洲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虽然日本的经济援助在几个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过去，日本曾经以退回到长期自我孤立（如在遇到西方的最

初冲击之后)，或者实行刻意模仿西方(如在明治维新之后)，甚至采用欧洲帝国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来对付外部的挑战。今天的危险则不一样。日本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变成军事侵略的国家，这是很不可能的——虽然拥有核的日本至少在开始阶段将在国际上引起不安。毋宁说，危险在于对外的不明确的态度，政治孤立的意识和加剧了的经济紧张的冲击，可能对这个国家产生非常不稳定的影响，助长内部各种严重的紧张状态，甚至是动乱。在亚洲这种敏感的和政治多变的形势下，任何这样的发展都将使寻求国际稳定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

所有这三个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将对大西洋世界发生不利的影响。中苏冲突，特别是如果长期拖延下去，将是世界和平的一个严重的威胁，最终可能迫使西方国家以某种形式，即采取经济援助或者政治上赞助的形式间接卷入。某种比较密切的中苏关系，特别是如果通过苏联对中国内部政治的某种干涉而达成的这种关系，将改变本章开头讨论的两个三角中的第一个三角而不利于西方。远东的核武器扩散，将使谋求控制军备的工作更加困难，更不必说对和平的更直接的危险了。此外，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大概还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这将进一步使东南亚的政治舞台复杂化，并且在印度洋本来已经捉摸不定的局势中引进另一个因素。拥有核武器的日本，将被它的绝大多数邻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同时，因外部挫折而加剧的日本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将意味着在主要的那个合作的三角中有一角突然处于真空状态，从而削弱了先进世界对全球性的一些问题作出有效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反应的能力。

所以大西洋和太平洋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影响，是生活的现实，而且这进一步突出了需要形成一个跨越两大洋的政治利益的共同体。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诸如台湾、新加坡

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经济投资的日益重叠，未来岁月中的这些共同利益很可能要加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大西洋—太平洋世界对于亚洲稳定的共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欧洲和日本，还有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在十年内将进一步加深——引起了要求对终究是不可分割的国际问题形成共同的政治观点的另一种压力。

假定我们的讨论到此已证实了我们开头提出的两个命题的某些正确性，进一步申述以下第三个命题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在未来的岁月里，先进的非共产党世界的三个主要单位将觉察到，更密切地进行协商既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稳定和进步的共同利益。

这种最终将促进更加密切合作的协商之所以需要，还因为这三个单位都面临缺乏远见的危机。美国尚待从越南战争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正力图确定自己同这个世界的新关系，虽然它近来一直试图玩弄某种多少是目光短浅的经济边缘政策的手腕，从而加强了一些大国从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出发去观察世界的倾向。欧洲还须在政治上自我表明，并为自己的精力和创造能力谋求发挥某种有益的世界作用，以期保持它的历史传统。日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态度则必须从自我中心的经济动机超脱出来，特别是现在美国政治保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三个单位之间更加密切的相互影响，对于每个单位都将是有益的，对于已经扼要提到的政治问题也将是一种建设性的反应。世界的稳定和进步——我们时代和平的孪生条件——不可能按地区加以分隔，特别是在象亚洲这样多变的背景下，在势力重叠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里。

提出这个主张，并不是要求大西洋—太平洋的各种关系现在就应着手照搬大西洋世界内部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实行的合作

和机构建制的模式。要这样做，形势显然尚未成熟。首先需要的一些步骤是较有节制的，但与二十五年以前大西洋世界内部所采取的步骤相比，决非不那么迫切或者不那么重要。这些步骤首先是，三个单位的领导人要作出审慎的决定，就包括亚洲的稳定和进步在内的一些共同关切的课题，开展更加持久的政治协商。这样的决定，对于克服美国今天出现的把握不定的情况，克服欧洲人的狭隘的眼界和克服日本人的看法中那些潜在的矛盾的不明之处，都将大有裨益。

实行这样的决定，可以采取几种形式，所有形式一开始都应该是适中的，远不是任何类似一个联盟或者一个正式的共同体那样的东西。

首先，为了鼓励这三个单位的政府机构之间具有更大程度的共同政治观点，为了促进实行定期的和日趋正式的政治协商，并为了拟订有关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或一些地区的共同的政治规划，下述做法将是可取的：

——采取举行三边内阁年度会议的常规做法。其模式多少类似美日内阁会议。按照三边的安排，这种会议可包括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以及日本和美国两方面；

——成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特别是成立一个规划共同政策和进行检查的班子来加强上述会议，这部分地是为了支持上述会议，部分地是为了促使共同观点和政策的形成并使之具体化；

——为促进更大范围（包括“合作的三角”的正式范围以外的国家）的协商，更经常地举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外长会议将是有益的。它便于更经常地考察共同的政治问题，又便于促使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作出共同的反应。

其次，为了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在这三个主要单位的杰

出人物——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界等方面的——中增进有关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的意识，以便妥善地处理那些使当代世界感到困惑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问题；为了在这些杰出人物中开展更密切的个人接触和更坦率地交换意见；为了克服那些特别妨碍日本人参与世界事务的文化上和语言上的障碍，下述做法将是可取的：

——让日本人参与各种非正式大西洋机构中的某些机构，这类在最近二十五年中发展起来的机构，对于相互信赖和相互谅解的意识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没有坦率的和持续的对话的坚实基础作为根据，又不是通过各国的杰出人物的个人联系来加强，民主国家的政治合作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比尔德贝格会议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日本人参加这些会议，应该说是前进了一步。

——除了上述之外，还要成立一些特别的三边机构，目的在于促进共同的方案、研究和讨论。在三边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做法，其本身就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行动。在这方面一个可取的和重要的步骤，是现正由一些显要的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为就共同关切的问题拟订共同政策而成立的三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研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既拟订有关的政策，又作为促进三边相互接受意见的一个行动组织。

——在实际可能的广泛的政党的基础上，举行各有关国家的国会议员三方会议。

最后，谋求亚洲稳定的均势，将要求亚洲本身作出若干新的安排，虽然这些安排也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大西洋世界。例如，虽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其他先进国家之间各种经济联系的扩展，已经在形成一个太平洋—大西洋的相互依存网，但是日

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就政治问题进行更密切的协商，看来应该还是可取的，因为这样一个太平洋的海上三角不会成为亚洲大陆的威胁。

同样，在亚洲就远东稳定问题进行的四国协商（包括美国、苏联、日本和中国）——也许可以走向正式通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并探索亚洲无核区的切实可能性——在不久以后举行，这可能是适时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何时，如果经济上行得通，美国、日本和欧洲对西伯利亚或者对中国的发展搞联合的而不完全是单独的冒险事业，将有助于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在亚洲组成一个更大的合作网。

这类议事日程显然是雄心勃勃的，不可能很快实现。然而，根据这些方针采取的审慎行动，对于已扼要地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危险，将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反应。这将是有关各方的利益所在，将有助于在世界体系内形成一个迫切需要的稳定和合作的核心。

（摘译自理查德·梅恩编：《大西洋的新挑战》，查尔斯·奈特有限公司，1975年，伦敦）

二、美国的对外政策：探索焦点

一

大约在三十年前，美国被卷入了世界事务。那种令人震惊的经历，在美国对外事务方面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对于一个民主的和多元的社会说来是不寻常的。二十五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终于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和似乎能辨别方向的好处，主要是那次冲击的结果。

在那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卷入世界事务的特征是：越来越强烈的行动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以及浓厚的人民党的善恶对立说。行动主义者的国际主义，部分地是对美国早先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普遍感到内疚的反应，美国现已成为国际事业最积极的提倡者——这似乎是为了洗刷过去。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把最终将出现一个各国联合为一体的世界的强烈信念，同公众空前地要求让其他国家分沾美国恩惠的意愿结合起来。人民党的善恶对立说则反映了人民群众把对外事务当作魔鬼的倾向，这种倾向由于希特勒主义，后来又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现实状况而大大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冷战，都使美国在卷入世界事务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焦点。对外政策的目标是比较容易规定的，也可以使之充满高尚的道义内容。诚然，处理冷战问题不时出现的挫折，促使各个总统从不同的角度来规定他们的政策

和重点，但美国卷入的基本性质依然不变。罗斯福总统把公众的希望集中在"四大自由"上，但是雅尔塔的挫折——这是不成功的现实政治之一例，与流行的理想主义是不一致的——不久以后导致杜鲁门总统呼吁遏制斯大林主义和重建欧洲。朝鲜战争的挫败，又导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争取自由运动"，甚至包括解放东欧（从而否定了雅尔塔）的目标。美国在1956年东欧大动荡面前的被动状态，以及接着因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而产生的丧失信心的危机，导致肯尼迪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发表崇高的普济主义的教义，把强烈的反共主义和同情贫穷国家的辞令结合起来。但是他，尤其是他的继任者约翰逊总统，很快就被越南战争困住了。到尼克松总统就职的时候，美国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意见的一致性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

根据前面谈的一些事实，要断言正是越南战争模糊了美国的视线并损毁了它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一致的观点，那还为时过早。五十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对外事务的态度的值得注意的论文，指出这种变化可能是更加复杂的各种力量的产物，因而越南战争主要是一个促进因素，而不是一个起因。该文作者系统地整理了有关对外事务的各种资料——总统的咨文、政党的纲领、选举的结果、历次签订的对外条约、海军开支、武装远征、战争、并吞、外交警告——论证了1776年以来美国同世界关系的特征，一直是"外向"和"内向"的交替循环。他以非凡的先见得出结论："考虑到美国以往的历史和'内部因素'对促进这个内向—外向循环运动所起的假定的作用，预料美国至少将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么多地卷入世界事务的情况中退出来，而且或许在六十年代的某一个时候就会这样做，这看来是合乎逻辑的。"①

在我们着手进行分析的时候，回顾这个预言是合适的，因为

它加强了这样的论点，即当前美国情绪的变化可能体现出比对越南战争的反应更为深刻的某种东西。已经发生的变化——文化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人们在新一代的价值准则方面，特别是在厌恶"强权政治"方面，在对美国现在对外承担义务的普遍的矛盾心理方面，在国会的情绪方面，特别是对有关对外卷入（甚至包括对外援助这样的利他主义的卷入）以及作为国际主义者的美国东部外交事务名流的没落等方面，都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民主党方面喊叫的"回家吧，美国"，和共和党方面主张的经济保护主义，可能反映另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反映美国同这个世界不断变换的关系的一个新的循环。

二

当前美国情绪的变化，同早先的从外向到内向的转变，有许多显然类似之处，但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些类似点都是令人误解的。无论就客观方面或主观方面看，实际上都不是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进行抉择。在当代各种条件的背景下，要解释这些名词的实际意义是困难的。

---

① 弗兰克·L·克林伯格："美国对外政策基调的历史性交替"，见《世界政治》，1952 年 1 月。他所说的一些阶段如下：

内向	外向
1776—1798 年	1798—1824 年
1824—1844 年	1844—1871 年
1871—1891 年	1891—1919 年
1919—1940 年	1940— 年

可以注意的是，外向的阶段持续了大约 27—28 年，所以按照克林伯格的分析，最后的外向阶段理应在 1968 年左右终结。

在客观方面，美国发觉自己所处的形势，与以前几次转为内省的循环时期的形势完全不一样。在经济领域，美国现今无论对不发达的或先进的工业经济，都是主要的国际投资者，而这些投资的利润对于若干美国大企业来说，都体现着它们的边际利润的关键性的源泉。美国企业和资本的向外冲击，使得美国很经不起任何新的保护主义的浪潮，这种冲击也的确造成了一批拥有巨大既得利益因而反对任何回到"内向"的强有力的选民。

与此相关的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资源上自给自足的美国经济，转变为资源上日益依赖的经济。有些专家估计，在美国工业经济所消费的大约三十六种原料中，已有二十六种依赖进口，而且这种依赖正在极其显著地增长，但决不仅仅限于能源方面。这种转变正在把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强加于美国经济（因为矿物进口在1970年就花掉八十亿美元，到1985年很可能要花三百一十亿美元左右），同时也使美国同稳定而持续不断的国际贸易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其结果，美国发觉自己如此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这种情况又为它在货币方面的特殊作用所加强，因此就经济方面而言，孤立主义的设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一项自杀政策，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离题的设想。

社会的各种动态，加强了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事实，这些动态包括旅游业、美国人出国学习的人数和外国人在美国学习的人数以及一般的交往的大量增长——在所有这一切当中，美国都走在前头。这个过程产生了更多的联系，使美国同世界的关系，从过去可以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有所选择的关系，转变为问题仅仅是相互依存的形式和程度如何的关系。

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的选择同样地发生了变化。过去，美

国在克制和卷入之间可以实行惬意的抉择。现今，尽管对美国继续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是否可取的问题有所争论，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却认为，他们的安全同欧洲和日本保持独立和稳定是紧密相联的。对于军队水平的争议，是关于如何使用最好的手段来加强那种相互依存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相互依存的现实性甚至或者是否可取的问题。更广泛地说来，核武器已经如此地改变了安全的性质，以致政治安全均势的种种突变，都被看作对所有各方、甚至是对正在竞争的各方的危险，这就甚至在敌对者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依存的问题。

主观态度的问题更加复杂，虽然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是很有启示的：那些支持保护主义政策或支持美国撤销它所承担的各种安全—政治义务的政策的人们，都反对被说成是孤立主义者，并坚决认为他们提倡的政策具有一种更崇高和更负责的国际主义。而且，许多口头上批评美国对外干预的人们，都倾向于强烈反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孤立主义，反而支持美国继续卷入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甚至扩大这类卷入。尽管如此，老式的孤立主义确实还是让人家听到了自己的谐音，最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工人阶级内部，他们担心把美国人的职位向国外输出（这种输出，一是通过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是由于外国货的输入对于就业问题发生类似的影响）。但是在这方面，这种态度也并不一贯如此。工人阶级也倾向于强烈支持美国在国外继续承担政治和安全义务——它充其量不过是半孤立主义者。

因此，从政策高度来看，孤立主义往往是一种不完整的观念而不是一种首尾连贯的无所不包的主义。甚至它的追随者们也承认美国至少在某些方面还应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这个主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带有一点残留的虽然是模糊的一致性，即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实体，要从中完全撤出是不可能的。

世界相互依存这个广泛而没有明确界线的概念，看来体现着绝大部分美国人所同意的普遍原则。

然而，这种潜在的一致性是模糊的。它不象过去那样，现在并没有一个能阐明美国同世界关系的性质和基本目的的鲜明的中心观点。何况，现今在有关的和有发言权的公众当中，代表主要分歧的两个进行争论的思想流派，以大不相同的方式，赋予世界相互依存这个共同具有的概念以哲学的和政治的内容。对这两个进行争论的流派的观点——它们一开始都从世界相互依存这同一个基本前提出发——用“力量现实主义”和“现世人道主义”这些名词加以概括，也许是最适宜的。

力量现实主义者的价值准则，总的说来是更保守的，在国际事务中，他们倾向专注于一些一向更为关切的事情，特别是诸如战略、武装力量的关系、均势、外交和货币政策这样一些问题。无论作为一个概念和作为一个标准，他们都非常重视稳定的意义。他们对于各种惯例和优先注意的问题，可能时常发生争执（从这个干脆可以用乔治·鲍尔和约翰·康纳利两种明显不同的立场来代表的流派内部的情况来看），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仍然被国际的政治所左右，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持有共同的基本看法。

反之，现世人道主义者则倾向于认为，世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某些共同的问题所困扰的一个单位。当他们试图把自己原有的基本倾向转变为政策时，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生态学、营养、发展、社会正义与和平，或者发展的限度等这样一些问题上（莱斯特·布朗的《没有国界的世界》是一个出色的样本，但是这里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从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到另一个极端的一些新左翼作者）。因而在上述美国“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比较陈旧的争论的分歧中就有谐音，但是不同点还是重要的：新的力量现实主义者越来越承认政治上相

互依存的概念，他们对稳定的关心，在某种程度上甚于理想主义者早些时候对和平事业的全神贯注。现世人道主义者与他们的前驱理想主义者不同。他们更关心世界的社会变动——而不是世界和平，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被各种能动地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危机所困扰，因而他们的补救办法便集中于社会—政治改革。他们中许多人大声反对稳定，并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激烈的变革也是可取的。

前者往往是年纪较大的人，从而这里无疑包括了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冲突这个因素（提出了同克林伯格的循环说类似的东西）。世代与世代之间在观点上的这种差异，大部分是美国社会近来经历的历史的不连续性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任何社会突然进入一个还没有确认的法则的新时代，就造成了小说家赫尔曼·赫西出色地表述的一种捉摸不定和意见分歧的局面。他的作品对于历史变动一向是很敏感的：

> 只是在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宗教交迭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才陷于真正的灾难，陷于最大的痛苦。……有许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整个一代人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进退两难，其结果是整个一代人丧失了理解自己的一切力量，没有标准，没有保障，没有真挚的默契。

过去十五年中，美国发生的事情大多切合以上引用的这段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近来经历了——大概比其他任何现代社会更加如此——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十年稍多一点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社会准则，种族关系，对性的问题的道德态度，审美和艺术标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必然在各代人之间产生特别鲜明的隔阂，其中也包括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不同意见。

由于美国社会内部观点相对一致的东部名流（迄今为止，这

个集团曾被当作是鼓舞和引导美国更多地注视战后世界事务的力量来源）几乎同时趋向没落，已经使美国的世界作用更加难以捉摸了。这个集团的瓦解，它的自信心的丧失，它的内部各代人之间的分裂，与美国社会中追求领导权的各种新集团的出现是同时发生的。这些反映新的经济利益、居住在偏远的西部和中西部的集团，给尼克松的新班子提供了一些人员，但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对世界还缺乏——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一致的和全面的观点。结果是焦点更加模糊不清了。

甚至那些走极端的人们（其狭隘的眼光常常有助于弄清焦点）今天也是心情矛盾的。传统上原来反共的、但现在被尼克松对共产党世界的灵活性搞得心慌意乱的右翼，正在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频送秋波，但又不愿意同那位迄今还在保护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对立的问题上成功地采取骑墙态度的总统闹翻。因挫败而士气低落的新左翼，主要是提出作为对外政策指针的一些口号，而它的社会基础则基本上依靠非常因循守旧的知识界，即纽约的大学生和教授以及某些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人士和新闻工作者。这样的社会基础是太容易变动了，不能为严肃认真地争得政权提供一个出发点。除了小圈子的忠实的读者以外，人们读《国民评论》和《纽约书评》是为了寻找刺激，而不是为了寻找指导政策的东西。

尽管有这种分歧和混乱，力量现实主义者和现世人道主义者仍然保持着根本一致的看法，即世界的相互依存——不管把重点放在政治安全方面还是放在社会福利方面——是我们时代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在这种基础上的一致，只不过驳斥了内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和有号召力的抉择的那种主张而已。就其本身来说，它并不为美国同世界的关系提供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焦点。

三

这样看来，美国并不是正在转为内向，但美国的视野是不清晰的。尼克松总统的对外政策既是这种暧昧状况的反映，也是对这种暧昧状况的反应。作为一种反应，它一直是有成效的，有时还是卓越的；作为一种反映，它仍然受到某种基本的设想上的难点的困扰。以实用主义引为自豪的理查德·尼克松，对于美国所处的变化了的环境的性质，比他的许多同辈理解得更敏锐——当然比他的对手更清楚。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对外政策是对整个世界和国内各种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反应。他看出国内的矛盾心理，在设计他和他的伙伴不时称之为"和平的新结构"的同时，力求制定一种能逐步减少美国在国外承担义务的政策。大体上说，这是一种与他自己观点的演变非常协调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虽然明显地得力于他的特别助理的卓越的意见——与威尔逊以来的任何其他美国总统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是他的政府的政策设想的设计师（那些偏爱否定尼克松任何功绩的批评者们却很少承认这一点）。

对外政策的制定破例地集中于白宫，特别是集中于总统和他的特别助理手中，部分地是由于尼克松在设想方面提供了高度的个人领导。但是这种集中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也是总统的政策的基本意图的后果，即根据他所理解的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现实状况，把重新建立与对手的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处理与对手的关系同按惯例执行的和公开明确表述的对外政策是不协调的。反之，它的真正焦点要求秘密，出其不意，玩弄花招，甚至多少搞些欺骗。

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基本设想的框框，实质上包括着某种传统的均势策略，但主要的是俾斯麦式的而不是梅特涅式的(正如詹姆斯·蔡斯在《别处的世界》一书中所恰当地指出的)。与依仗保守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致的梅特涅的静止的平衡不同，俾斯麦的平衡则是建立在变动和灵活性的基础上，建立在使朋友和敌人同样感到意外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尼克松的指导下秘密外交的作用为什么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原因；这就是组织体系为什么要求制定政策的工作如此集中，以及执行对外政策和制定对外政策都把制度化的官僚机构排除在外的原因。事实上，我们看到开展工作的机构、个人的癖性和对外政策的设想结合起来了。

在头四年期间——除了力求结束越南战争以外——尼克松的注意力一直集中于操纵美国—中国—苏联这个新的三角。这种操纵的结果，是对冷战作了部分的调整，并且把冷战从各自在其中按自己的准则行事、各记各的分的“游戏”，转变为至少是有一些准则渐渐得到共同遵守的“游戏”。此外，在美苏的竞争中，军备竞赛的中心地位业已多少有所减弱，其结果是竞争已经转到另一些对美国有利的领域。加以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进一步鼓励莫斯科重视美苏和解的同时，使得美国有一切可能削减苏联反对它从前的盟友的行动自由。而且，美苏的各项协议，已开始形成一个可能逐步有助于减少他们竞争关系的那种紧张状态的关系网，而总统还明智地(虽然不一定准确地)强调，美中关系的改进，一直不是针对苏联的。

和上述这些同时进行的，是不遗余力地要把美国承受的对盟国的负担转到西欧和日本的肩上，包括在1971年和接着在1973年采取的激烈的经济措施。结果是既费力又造成了紧张——但这一切也是同俾斯麦—尼克松的动态均势一致的（包括既不

承认永久的敌人，也不承认永久的朋友在内）。由于这种政策是根据国内普遍存在的认为美国单枪匹马干得过多了的情绪作出的反应，总统的措施就在这样两个方面表现出特殊的长处：既抵消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实质上是欢迎他接近中国和苏联的态度的，即使不赞成中国和苏联的基本哲学——的反对，也使越来越关心美国支付逆差的一些更加保守的支持者的反对归于无效。

如此说来，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包括了明智地应用力量现实主义，这是很可赞许的，这就巧妙地适应了国内的一般形势。它的巧妙可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即尽管国内有深刻的分歧，总统的对外政策却大体上一直没有成为全国大争论的对象。即使是那些否定它的基本前提和重点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就。

虽然如此，尼克松总统的对外政策不但在历史的恰当性的更广泛的方面，而且在实施方面，还是有几点可以批评的。更具体地说，有三个问题值得批判地加以考虑：第一是政府方面对不发达国家的一些问题十分冷淡；第二是有关政府处理盟国关系的问题；第三是关于均势策略对于七十年代的世界事务在历史上的恰当性的问题。

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道义问题。根据美国的传统来看，单是这个问题的含义就应该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何况，几乎每一种指标都表明，落后和贫困的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尖锐：世界银行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国际教育的研究，粮食和农业组织关于农业发展的研究，一致认为差距正在扩大。与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不同，那时客观上的变化大体上比主观上的变化要快，今天主观上的变化却比客观上的变化更快得多。学文化的机会，报纸的流通，群众性宣传工具的影响，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这些使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变

化，比现在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来得更快。结果是对于世界不平等的认识提高了，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决心也增强了。社会斗争和全球性仇恨的加剧，是人类未能解决世界不平等问题的必然结果。

政府在处理盟国关系上也一向有缺陷。政府在对付美国和欧洲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虽然不是孤立主义者，但肯定一向是单方面主义者。结果是，日本感到被孤立和被出卖了，加拿大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美国同欧洲的关系也大体上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日本人猜疑美国现今把美中关系看得比美日关系重。欧洲人对美国在欧洲的长期意图感到不安，并且对美国在诸如更广泛的东西方会谈或者承认当前欧洲领土的安排（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没有承认奥得—尼斯线的唯一大国）这样一些课题上故意拖拉而另一方面却情愿直接同苏联打交道，感到迷惑不解。最近货币方面的难题加剧了政治上的不快感，部分地是因为美国更多地依仗单方面主义的战术手段，而不是依靠发展一项更广泛更长期的战略政策。

第三，人们可能怀疑，对于一个受迅速的变化、越来越尖锐的社会悬殊和对不平等的普遍不满所支配的世界说来，均势的策略是否能作出恰当的反应。人们经常注意到，参加这种均势游戏的一些主要力量却具有完全非均势的特点：说美国和苏联在军事上正好势均力敌是有道理的，但在经济上肯定不能相提并论；日本和欧洲在经济上可以同美国和（或）苏联匹敌，但在军事上则肯定不是对手。中国在军事的某些方面可能成为一个对手，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大可能在经济上匹敌。因而要在这五种力量当中探求平衡，可能证明是无从捉摸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把力量现实主义的看法作为全面理解我们时代的历史条件的手段是否适当。力量现实主

义者争辩说，贬低国家力量、外交手腕以及国际行动中的比较传统的各种手段的重要性，会助长国际的不稳定，从而危及争取和平的机会，他们的这一理由是强有力的。他们论证说，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现世的各种问题，虽然在道义上更有号召力，却忽视了这个有民族国家的，有国家对抗、国家军队和敌对意识形态的世界的现实，他们这样说也是正确的。现世人道主义者即使在精神上不是孤立主义者，实质上在许多方面也可以被指责为逃避现实的人。

但是，那些强调现世人道主义的人们警告说，忽视较长期的威胁，就会在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招致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瓦解，招致力量现实主义者所高度重视的稳定遭到破坏的局面，他们这样说，理由也是强有力的。此外，力量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平衡，主要地是以便于行事而不是以原则为根据。它意味着对于共同目标根本没有真心实意，对于共同的观念也根本没有公认的明确界说。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这样一种平衡，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使那些被美国认为是盟国的，特别是1971年美国给以盟国待遇以后的那些国家感到很为难。因而，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的看法，可能变成有传染性的，对美国的报应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快。

此外，在更迫切的国内问题方面，现世人道主义者可以正确地断言，实质上不择手段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开发美国人民的道义源泉的。实际上，由于疏远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这种政策助长国内的进一步分裂。因为道义上的种种考虑正在空前地成为一股更加非相信不可的力量，就美国已有的世界作用来说，这种政策也在国际舞台上削弱了美国。道义上漠不关心的美国，自然是更加虚弱的美国；非道义的美国，也就很可能要成为孤立的美国。

四

美国难以明确表达它可以接受的优先考虑的事情，这种困难由于国内相互争论的两个主要思想流派之间的内讧而本来已经很大，又由于战后年代对外事务方面所经历的变化而变得复杂了。简要地说，这种变化包括从一向把政治、安全和经济相对地划分为几个独立部分的国际政治，转变为政治、安全和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而且国内方面和国外方面的区别日益模糊的新的世界政治。

大部分由于冷战的原因，过去美国政治家们的思考中对外事务占有显著地位，而安全问题则占支配地位。今天，形势颇不一样了。相互依存的政治——主要是美国同西欧和日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亲近的结果——已开始使得同共产党世界对抗的政治相形失色，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又使过去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那种区分显得不合适。这些区分的界线一模糊，也许会大大妨碍美国人恢复关于世界和关于美国人过去几十年间在世界上享有的地位的明确概念。那种概念的明确性主要是危机时期的一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世界极化的产物。在各种利害关系交叠一起的世界上，这种焦点的明确性简直不能再现。

尽管如此，即使在这种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人们还是可以为美国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政策确定某些基本的重点。这类重点的公开说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它们的争议——可能终将有助于为美国的世界义务提供一个新的方向性的观念，而这种义务——本文已作了论证——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准备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予以承认的。这些重点中有些并不是新的东西，

但需要重申一下；有些则的确具有新的重要性。

美国和苏联之间现有的竞争关系，尽管部分地作了调整，但是作为过去遗留下来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优先考虑的项目。理由之一，是战争的危险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虽然战争作为政策的一种行动，现在成了只有一些贫穷落后的非核国家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实际上，在现代武器异常复杂和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发生意外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也许比过去更大。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必须继续努力把拟订中的美苏军备控制协议，用明文系统地确定下来，并加以发展。无论如何，人们希望苏联方面在避免意外战争的问题上，能有同样的兴趣。大力继续进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再者，有理由考虑到，苏联领导人在某个时候可能很想利用所声称的或者所想象的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优势差距，以便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榨取重大的和单方面的政治利益。如何避免这种实质上无法预测的政治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威胁，这是难以分析的，因为那种威胁，只有到了那样的程度，即当被威胁的一方认为非均势已发展到事关重大的时候，才有意义。但是，真正的深谋远虑则要求保持安全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身就能减少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可能性，即他们可以在某个时候断定通过引起某种严重危机的气氛以榨取政治利益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显而易见的安全预防措施外，发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甚至包括在中苏核力量的对比中起进一步稳定作用的某种形式的援助（例如把一些尖端的通讯系统让与中国），加上在贸易和科学方面已经着手进行的进一步合作的积极行动，也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的美苏关系。

这些积极行动，特别是如果在广泛的战线上进行的话（其中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很可能促进同共产党的中坚人物在

哲学上实行和解的微妙进程，从而结束一百多年来使西方分裂的日益不切实际的教义方面的内战。可以肯定，这种进程将是缓慢的，而且其中的倒退是可以意料的，特别是因为更加保守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不时发动反击，以确保东西方的联系不致使苏联和东欧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传染。这样一些分子甚至很可能在国内加紧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控制。不管怎样，在超出纯经济方面的广泛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东西方的和平接触，将不知不觉地凿掉共产党教义大厦上的较为过时的边沿，从而增加了争取东西方和解的压力。

如何同共产党世界打交道，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它也许不再是中心的问题了。何况力量现实主义者已经不断有成效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而且——如尼克松所表明了的——在使美苏竞争关系更加稳定方面，不无成就。但是，美国政策面临的另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和在先进国家中的同盟关系问题——却不能按照力量现实主义者的方法有效地加以处理。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实际上也是整个世界的状况，要求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现世人道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而同盟关系的问题，则要求把两者的方法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是需要的，因为国际事务正在经历着变化——一种甚至在旧的因素还部分地起作用的时候又引进新的因素的变化。我们早些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的出现，它使旧的国际政治日益不适于作为有组织、有理想的结构来处理世界事务。这类新出现的世界政治还有待赋予明确的性质：它们可能成为正在增强的世界责任和相互依存的政治——或者，它们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具有无政府状态，社会分崩离析，种族、人种和意识形态冲突加剧等特点，甚至还有过时的国际对抗再以

新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不发达国家的极为严重的问题是主要的，但比较先进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本身的性质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

现代社会正向一个新的时代突进，这个时代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在某些比较先进的工业社会里，物质财富正在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空虚，而科学的发展通过社会对人的一套管理办法，唤来了人的顺从性这个幽灵，从而给人类本身的尊严带来不祥的威胁。因而日益需要比较持久地考虑有关现代人类的状况，日益需要让那些在电子技术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工业社会进行相互学习。仅在一个社会（不论它是怎样富裕或者强大）的基础上，是否能够对这种内部问题——更不用说先进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了——作出卓有成效的反应，那是值得怀疑的。

美国的政策必须着手解决这项更新的和异常复杂的任务，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力求回答力量现实主义者和现世人道主义者都最关心的问题。现实主义和以往的教训清楚地表明，美国并不能独自提供所需的答案，在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和社会进步的世界的过程中，还要求那些具有一定的共同哲学设想和拥有必需的资源的人们作出更加广泛的努力。这种状况首先给美国、西欧和日本强加一项特殊的义务，即制定它们的政策时要考虑到更为广泛的利害关系，而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利益。除非世界这些先进的部分趋向于更多的和更积极的合作，虚弱的世界经济和刚刚出现的世界大家庭的想法就会遭到破坏，这样，世界就会重新陷入互相敌视的状态中去，世界经济就会支离破碎，而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紧张状态也就会加剧。

具有一定的共同政治准则的先进工业社会之间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将有助于形成一个世界政治的稳定核心。在这个基础

上，就可以对传统的战争威胁，对由贫穷所引起的社会分裂的新的危险和对世界经济体系崩溃的更广泛的景象，作出更为持久的反应。大西洋这个概念，曾经是对冷战时代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创造性的反应。但在今天，大西洋的范围是太狭窄了，不能包括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大量挑战和机会。正是承认这种现实，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进一步密切合作，今天各项主要问题就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而且对这种三边合作的积极促进，现在就必须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重点。

这无非是意味着这三个力量中心之间要进行审慎的、更密切和更加制度化的政治协商。没有这样的协商，那些甚至包括"大西洋新宪章"在内的正式公告，也很可能是没有实际内容的。这些旨在拟订有关世界大家庭面临的各式各样问题的共同政策的协商，一开始就必须建立在三边平等的基础上。先加强大西洋的联系，然后邀请日本进来——根据亨利·基辛格1973年4月关于美国和欧洲关系的重要的和经过推敲的演说来判断，这似乎是政府支持的一种做法——那简直是不够的，从心理上说也是错误的。此外，尼克松总统1973年关于世界情势的咨文，还指责日本在日美安全条约方面"损人利己"；这样的断言只能使已经紧张了的美日关系恶化（实际上，由于日本对美国最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迫切需要的东西给予方便，正是应该公开地赞扬它的时候了）。无论如何，任何新的倡议，必须一开始而不是"最后"把日本包括在内。

更具体地说，实现谋求更密切的协商关系的决定，可以采取几种形式，但所有形式开始时都应是不过分的，绝不能象某种联盟或正式的共同体那样的形式。首先，为了鼓励这三个单位的政府机构之间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促使实行定期的甚至更正式的政治协商和就有共同利益的一些问题或地区

拟定共同的政治规划，以下几点是可取的：(1)作为一个例行的事项，采取举行三边内阁年度会议的做法，其模式多少类似美日内阁会议。在三边的安排下，这种会议可以包括共同市场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两方面。此外，在不那么经常的基础上，或许还可以安排一些有关政府首脑的定期会议。(2)成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特别是成立一个规划共同政策和进行检查的工作机构，来加强上述会议，这部分地是为了支持上述会议，部分地是为了促进共同观点和政策的形成以及具体化。(3)促进更大范围(包括"合作的三角"的正式范围以外的国家)的协商，并且更经常地举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外长会议，以便考察共同的政治问题，并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作出共同的反应。(4)在尽可能广泛的政党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国家的议会议员的定期的三方会议。

关于上述的一些建议，应该记住的重要之点是，争取成立发达国家共同体的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和逐步的过程，要使它实现必须审慎从事。把这种设想作为一个可取的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朝这一方向前进了一步，虽然必须承认"共同体"一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已。尽管如此，由于这样一些协商，最后可能对那些已使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关系弄得很紧张的货币和贸易的困难问题作出比较持久的反应，同时也就政治合作的具体问题、世界安全问题和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问题，达到某种比较广泛的意见的一致——虽然不一定是协调的政策。自由贸易一直是过去二十五年中世界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是，近来不断加剧的不平衡状态已经造成了在保护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新的贸易战争的威胁。更密切的三边协商，可能有助于形成第三种更健全的、由各种新的货币制度来加强的办法，其中包括更加审慎的定期调整。

这样一种三边关系还应建立在把美国、欧洲和日本连结在

一起的各种安全考虑的基础上。这样的连结早已存在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更加明显。中国人正在拟订一种对西欧的政策，即鼓励西欧的一体化，以作为对付苏联在欧洲的势力的平衡力量。他们对即将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的态度，已经使人感到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且，他们继续鼓励东欧的苏联集团内部任何闹独立性的事件。对影响欧洲的中苏对抗作出协调的反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的问题。由于共同依赖石油，在中东、从而也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这样一些战略地区，西欧人的利益又和日本人的利益交叠一起。不能把这样一些安全考虑，同这些对他们的福利有极大关系的经济利益轻易地分割开来。对美国来说，单方面地承担它的一些主要盟国的无所不包的安全的需要，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美国减少了它的世界作用的时候。

毫无疑问，这样的三边合作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必须加以克服。一些欧洲人可能埋怨那种似乎把大西洋关系看成与太平洋关系同等重要的做法，并且猜疑那种做法实质上是反映了美国人力图把美日关系中的某些不平衡转移到欧洲人的肩上。一些日本人可能觉得这种倡议反映了要把他们卷入一个扩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意图。这些担心是实际存在的，虽然未能证明是有理的。由于历史上和文化上的许多充分的理由，大西洋关系在一段时间里仍将不是太平洋关系的同一类型，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各种贸易和货币问题，早已对大西洋关系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致简直不能把它们单独分开来处理。然而，承认这种现实，并就上述问题以及更广泛的世界问题要求在政治上作出更广泛的反应，这样做并不是要把北约的机构扩大到太平洋，而是要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作出反应。所以毋宁说上述那些忧虑，是强调了三边协商需要更持久地进行和三边的联系

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否定这种必要性。

确定这些目标就会对华盛顿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方式产生一些有效的影响。秘密的、高度的个人外交，着重依靠耍花招和出人不意的手法，用以应付敌对关系是非常合适的。但它必然是短命的，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它对于处理美国—日本—欧洲关系这样复杂的问题是不适宜的。最近日本的反应——包括取消裕仁天皇的美国之行——表明秘密的单方面主义是有传染性的。三边关系，无论它们是货币、贸易或安全方面的，都必须通过稳定而广泛的谈判来培育，并通过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来加强。因而恢复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权力，是实施以上扼要提到的更为广泛的战略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个试图形成发达国家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更大程度的协商，去讨论有关世界政治的主要的、较长远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贫穷的问题——这是现世人道主义者所最关心的问题。可以预料，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我们将目睹第三世界因人口增长和教育普及这双重的冲击而引起的加深的危机。当平等正成为我们时代在道义上的最强烈的要求时，这种双重冲击将使世界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因而对平等的要求，可以与十九世纪自由的概念的号召力相比拟。

在各种社会内部和在世界范围内，都已使人意识到这种对平等的追求，所以较富的国家必须对世界较穷的部分拟订更全面、更合作和更有计划的政策。这些政策必须使所有先进国家更多地参加旨在改善第三世界命运的各种组织（例如，日本可能作为一个成员参加拉丁美洲发展银行而起作用，欧洲和美国也可以参与其他地区的这类活动）。关于发达国家的共同体的设想，常见的异议之一，是它可能成为对第三世界问题漠不关心的

“富人俱乐部”。可是除非先进国家确实合作，作出较大的反应，那就很难看出第三世界面临的那些巨大的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如果世界三个最强有力的单位被它们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动力推到日益加强的保护主义和其他经济的冲突中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是不能实现的。

同样，有些提出异议的人认为把三边合作作为美国政策的中心目标，这与改善同共产党世界关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那种改善是不大可能在不稳定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这种不稳定会助长共产党领导人残留的革命热情。包括最富和最强的国家在内的进行合作的世界的那一部分，力求拟订旨在促进第三世界发展的共同政策，比起那种往往是在竞争情况下所谋求的单独制定的缓和政策来，将更可能发展同共产党国家持久的和建设性的关系。

的确，一个逐步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共同体，将能更好地谋求真正的缓和。这种缓和的目的，不是追求一个根本上与世界的基本动力相冲突的、人为地分割开来的世界，而是追求一个势力范围消失了的世界。正如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一定要衰落下去（美国也在开始承认这种现实），也正如日本的亚洲共荣圈与亚洲的民族主义不能相容，同样，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也将不得不逐步为一个属于更广泛的欧洲联合的东欧所取代——虽然保留同苏联的某种联系。

以上扼要叙述的政策，将涉及为建造一个稳定的和进步的世界大家庭的目标提供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这种政策由于对力量现实主义者和现世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规定的政策重点有分歧，却都承认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所最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它也可能导致美国的世界义务进一步明确起来。

（摘译自美国《外交》季刊，1973年7月）

三、谈谈东西方关系

西方制定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时应该有全球性的通盘考虑。我们的世界变得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它主要是由获得了民族解放的国家——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现在也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那样由四十个左右的国家组成，而是由大约一百五十个民族国家组成。因此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十分清楚地说明它承担的长期义务（这与美国自己在国内致力于自由这一首要目标的努力是一致的），是要建立一个既是多极的又是不断加强合作的世界。这要求接受世界政治制度的多样化和愿意同其他的国家一起参加制定一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所产生的国际体系要广泛而且包括的国家更多的国际体系。在一个有这么多新国家的世界上，就需要大大改革现有的国际安排。除非对现有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否则它就有真正崩溃的危险，从而使关于一个敌对世界的说法成为自行应验的预言。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对外政策应当谋求实现三个互相关联的优先任务。我们的第一个优先任务应当是在北美、西欧和远东的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比较稳定和合作的关系。这种带有三边性的优先任务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世界体系中最富有的和在经济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合作，无论是南北方关系还是东西方关系都不会是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代表的道德方面的价值标准对于人类的发展——无论是

社会发展还是精神方面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国际体系的改革必须加强南北方合作。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新国家参加这种合作，从而把比较温和的国家与比较激进的或比较有煽动性的国家分开。在这样做的时候，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必须关心许多新国家所关切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安哥拉冲突的处理失当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害，并为象苏联这样的敌对国家提供了机会。

第三、东西方关系必须改善，缓和应当是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问题。我们意识到美国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以及政治方面的冲突将长期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应当努力使它逐步缓和下来。为了实现这种缓和，既有必要保持警惕，也有必要实行合作。因此，保持一支强大的美国军事威慑力量是实现稳定的、相互的和越来越全面的缓和所需要的先决条件，这种缓和不仅将继续是合作性的，而且也将继续是竞争性的。

上述三项政策是相互关联的，要明确规定其轻重缓急的次序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分明显的是，除非先做到第一项，否则，要使第二项取得进展将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日本—欧洲之间不实行更密切的合作，要拟订先进世界需要对发展中的世界执行的那种政策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关系更密切和更加协调的西方政策，事实将证明，不论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还是国际经济合作会议都不会取得成功。最后如果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优先任务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东西方关系就将仍然是互相冲突的。全世界的不稳定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东西方关系，使它的合作性减少，竞争性增加，使它不那么容易预测而更加相互敌对。一个不稳定的世界自然而然地会导致进一步的美苏直接对抗。

今后这段时期中，在三边关系方面，将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必要的协商和增进相互了解。对于建立一种三边协商机构的问题，必须给予某种考虑。在这种机构中，欧洲共同体也许有可能通过一个代表同日本和北美的代表合作。此外，先进国家可能考虑更多地注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内部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并通过一致的努力来协调它们的态度以处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此外可能根据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改变中的地位而考虑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问题。

关于南北方关系，美国在第七届特别联大和最近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都支持制订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完成这些任务是建立一种稳定的和越来越合作的南北方关系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所谓新经济秩序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还需要考虑加强现有的南北方谈判的讲坛。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可能证明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进行磋商的一个建设性机构，而根据三边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建议，也许应该建立一个小型的秘书处，来帮助它工作。可能要求建立一些新的机构来处理深海海床的采矿问题。

除了这些紧迫的问题外，还需要加强南北方之间的合作，以减少核扩散的可能性，和对诸如粮食、人口和环境等紧迫问题制定共同的解决办法。为了减慢核武器扩散的速度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将要求提供核技术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便暂停出口浓缩铀和再加工的成套工厂设备，并且要求作出一些安排，以便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取得核燃料的机会，这些核燃料将是为和平利用核子能而提供的，不会增加核武器和核扩散的风险。

关于东西方关系的问题，鉴于核武器竞赛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达成一项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仍然是最重要的。加强美苏合作以防止核扩散，也是可取的，我坚决同意卡特州长

最近提出的关于美苏停止核实验五年的建议。苏联今天也许是工业国中最自私的国家，它仅仅拿出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用于对外援助，因此应该作出努力，使它更多地参与共同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工作，如食品问题。

在处理现有的或新出现的区域性问题方面，美国也应当设法探索取得苏联更大程度合作的可能性。这将要求苏联在诸如中东或南部非洲等地区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也许还要求它有确定某些地区为相互克制地区的意愿。在这方面应该重申，如果苏联领导人认定苏联在政治意志方面或军事力量方面明显地比美国优越，那么，缓和就不大可能是稳定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人的自信心以及美国有足够的战略和常规军事力量，是建立较为稳定的东西方关系的先决条件。

此外，对美国来说，保持和扩大它同中国和东欧的关系应当是可取的。一个多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是一个比较多极化的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共产主义的多中心化，也是共产党政权逐渐演变为国际社会的比较合作的成员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应当重申我们继续希望象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保持独立，而我们也应当避免给人以任何表明美国赞成把世界划分成一些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的暗示。

上述各点显然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和非常笼统的行动日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事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传统的战争威胁之外，还增加了世界混乱的新威胁。过去，美国政策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保卫自由。在这个新出现的阶段中，我们还必须根据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对我们的基本社会准则的明确看法，努力支持促进世界正义的行动。

（摘译自英国《研究》季刊，1977年第100期）

四、美国对俄国提出新挑战①

问：布热津斯基先生，你一定知道人们批评卡特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它在四面出击。你对此如何答复？

答：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答复这个问题。

首先，总统自1月以来在对外事务方面做出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在选举以后就马上抓起来的精心计划的产物。我们所采取的几乎一切行动——我甚至可以说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政府就职头九十天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一段时期的最高潮就是伦敦最高级会议。我认为，这项计划极其有条不紊地得到了贯彻。这些都不是随便采取的行动。

我们认为，我们现正处于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美国必须再次承担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创造性工作。这必须考虑到在过去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所累积起来的后果：大批新国家的出现、异常迅速的非殖民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新希望的涌现、世界人口整倍的增加。

问：你是否预料将会出现一个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新时代？

答：如果称它是一个美国领导的新时代，那可能太刺耳了，而且可能使人误解。但这肯定是一个发挥美国创造性的新时

---

① 本文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单独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时发表的谈话。——译者

代，这一次是以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比1945年到1950年之间在程度上大得多的合作为基础的——那时我们曾同样地在国际上进行过创造性的努力。

问：这是否意味着同苏联合作？俄国人对此是否仍持过分敌视的态度？你实际上是否在向莫斯科提出挑战，要求帮助我们塑造一个较为和平的未来？

答：重要的是设法创立一个抑制竞争和防止侵略的合作的机构。我们正在设法促使苏联共同参与处理那些最终会使我们陷入真正严重困境的问题。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向苏联人提出挑战，要他们跟我们合作，否则他们就得冒在历史上不恰当地对待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的风险。

我们不至于那么天真，去期望马上会实现和解。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警惕这样的事实：竞争在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竞争。但是我们也非常了解这个事实：在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上，合作的必要性变得更紧迫了。我们要促使苏联在平等和负责的基础上参加这样的合作。

问：你的政策和亨利·基辛格的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同苏联人搞缓和——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答：我认为，那种缓和是可取的，我们不会怕用“缓和”这个词。

但是对我们来说，缓和实质上意味着逐渐取得和解。缓和意味着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而且，对我们来说，缓和还意味着是一个过程，如果它将持久地存在下去并为美国人民所接受的话，必须既是有来有往的，而且是越来越全面的。

问：你的意思是，缓和不能是一条单行道——

答：“有来有往”意味着比赛的规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

的。它意味着，一方不能认为可以自由地宣布革命原则或某些必然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它有权对其他社会的社会秩序发表评论或者甚至直接煽动革命暴乱，而与此同时，如果另一方对它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基本原则予以肯定的话，就把这看作是一种干涉行动。

有来有往还意味着更具体的关系——接近、联系。这就是要使缓和保持下去而必须做的事情。

问：你提到缓和还必须是更为全面的。那是什么意思？

答：它意味着，缓和不能在有选择的、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的基础上进行。

如果美苏关系的内容是在世界的一个地区实现和解，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肆无忌惮地利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种动乱的话，难以想象这种关系是会稳定的。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竞争将会在进行合作的某些领域重新出现，甚至会破坏已经开始的合作。

问：因此，你在暗示说，美国和苏联在非洲进行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可能会使缓和完蛋——

答：人们在用词时必须非常谨慎。"使缓和完蛋"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立即发生冲突这个概念，也许甚至意味着出现战争威胁，那可能是把它夸大得太过分了。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的问题，如果在非洲出现了肆无忌惮的竞争的话，即利用代理人的力量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话，那么，肯定会毒害进步并对已经进行合作的一些领域产生不利的影响。

问：为什么本届政府明显地从它早些时候支持苏联的人权的强硬立场逐渐后退？

答：我不认为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声明在内容或调子上有

丝毫改变。改变了的是报界对这个问题报道的数量少了。

从总统就职那天起到万斯国务卿最近就人权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们一直在说，人权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美国人的信仰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美国抱有一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的理想。因此，它决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具体关系或进行具体谈判的一项条件。

这一直是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并由万斯加以阐明。所出现的情况是，在不同的阶段，对这一立场的某些方面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声明所造成的。

问： 关于我们同苏联关系的另一方面：你怎样看待俄国人在缓和期间继续大规模地加强军事力量这件事？

答： 我认为这是一个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可能部分地解决的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目的就是为双方的稳定和均势创造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现在是如此敏感和如此非常重要的缘故。

有人在过去可能认为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部分原因是对美苏关系中的那种实际的或是感觉到的非均势的情况的一种反应。这种看法现在不再是普遍的了。因此，关于为什么苏联人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了协议，导致了稳定和均势，那么，我认为答案可能并不是很不吉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这样的一项协议，那么公众和国会必然会带着越来越大的紧迫感提出这个关于苏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动机问题。

问： 如果到了十月份还达不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是否意味着一场失去控制的武器竞赛？

答：不一定。实际上多少要看出现的情况而定。

问：另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卡特总统从南朝鲜撤走美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将在亚洲造成一种美国正在削弱它所承担的义务的印象？

答：首先，美国根据条约关系对南朝鲜承担了义务，那条约关系目前还是有约束力的。

第二，美国还没有从南朝鲜撤走任何部队。我们将同南朝鲜人和日本人讨论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和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应该作出什么样合适的安全安排。

我认为还值得注意的是：南朝鲜的人口比北朝鲜多一倍，它的经济也非常成功；军事机构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部队表现得非常出色——最近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就是这样。所以，人们当然可以再研究一下朝鲜今天的形势，并把它同五十年代(目前的这种军事安排形成于那个时候)的形势加以对照。那时，南朝鲜是贫困的、荒芜的并在不久前受到过蹂躏等等。

在我看来，认真负责的政治家的作风要求对形势定期考察，并需问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应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不是意味着要作出仓促的决定或反复无常地改变安排——但是这的确意味着要对过去不可能做而现在可能做的事情作出判断。

问：你对日本可能作出的反应——例如，关于日本可能变成核国家的一点迹象——感到担心吗？

答：在日本的政治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日本由于这种或其他事态的发展而有变成核国家的可能性。你不能根据纯属猜测的推论来估价可供选择的政策。

问：不管我们在南朝鲜做些什么，你是否期望着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会有助于维持亚洲的稳定局势？

答：毫无疑问，苏中之间的关系同五十年代的那种关系是不同的，这种关系还在远东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

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关系之一，那是公正的。至于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一种良好的工作关系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常识问题而已。

就中苏关系而言，这样由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所控制的国家，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预测往往是很危险的。但是看来的确是，由历史的压力、地理上的接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所积累起来的影响表明，这种冲突将继续下去——中国和苏联不会恢复它们过去保持的那种关系，不会恢复它们在五十年代的那种关系。

问：美国能不能利用这种局势来得到好处？

答：我还是不想使用"利用"或"好处"这些字眼。让我直率地说，这肯定会造成一个我们所赞成的比较多元化的全球结构，我们认为这种结构同我们关于如何组织世界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它也会减轻我们的压力。

这当然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即一个联合起来的中苏集团——性质上相类似，思想上好战——会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局势，而不是美国在其中既可逐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又可设法同苏联建立比较稳定和越来越富有合作性的关系的那种环境。

我想强调这样的主张：我们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建立在长期同苏联对抗，即无休止的冲突这个想法上的。更确切地说，它出自这样的一种想法：在我们今天生存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五十年代的思想意识的冲突越来越不相宜了。现在越来越需要世界上各大国之间实行合作去设法克服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各种

新的难题。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

问：就美国来说，迅速实现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以尽可能减少中苏建成一个统一的集团的危险，其重要性如何？

答：我认为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本身就有价值。我不同意把它看作是一种阻止中苏和解的权宜之计。

此外，中苏冲突出于内在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迹象表明是美中关系所引起的。如果有的话，因果关系就不一样。

这丝毫也不减弱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可取性。政府一直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我认为，不该把它看作是阻止中苏和解的一个手段。

问：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政策问题，对此我不想发表意见。我想你应当向万斯国务卿提这个问题。

问：布热津斯基先生，转而谈谈欧洲问题吧：美国是否应当设法把东欧共产党国家从苏联那边拉过来？

答：我认为，如果我们最终走向一个较为和解的世界，那么，狭隘的、多少是包得紧紧的势力范围的这种概念将会日益变得过时——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对外政策有意决定的目的。

问：换句话说，你并不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是设法使东欧国家同苏联分离——

答：我认为，重要的是必须抱有一个广阔的战略目的。如果人们觉得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动乱加剧的阶段的话，那么，重要的是，必须设法为这样的世界创建一个能够进行较大程度合作的结构。如果大国之间进行合作，那将会有某些成果。

举例说，美国在西半球的某些地区的势力范围由于历史的变化已经变得不那么单一了。我想，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大概也会发生这样的过程。

问：苏联可能利用铁托去世后产生的危机把南斯拉夫拉回它的势力范围内，这个危险有多大？

答：这个，南斯拉夫的独立首先是南斯拉夫人自己取得的。多年来南斯拉夫人一直表明他们是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的。

蒙代尔副总统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认识到南斯拉夫独立是欧洲稳定的一个因素——一个重要的因素。强调这一点，我们是肯定不会有顾虑的。

但是除非南斯拉夫人自己坚决献身于独立，否则独立也不能确保。根据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他们是打算保卫自己的，而这就必然要带来后果。如果一个拥有两千多万人的国家准备抵抗任何侵犯它的独立的行动，那么，那是世界事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这种独立会得到维护的一个重要保证。

问：在另一个地区——非洲，美国正设法在那里干些什么？

答：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生活的这种世界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必须是非洲的国际秩序的基础。

第二，我们认识到，正是由于这样的迟迟不实行多数人统治，今天对这种统治的追求就变得更加紧迫，也可能有更大的破坏性。

第三，我们打算设法使南部非洲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避免变成赤色分子和白人的冲突——如果暴力升级或外来的侵略势力被引进，它就很容易变成那样的冲突。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打算设法运用我们的影响，使在罗

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统治取得迅速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们打算运用我们的影响来鼓励南非人对他们的一些内部安排开始进行逐步改革，以免他们变成一种大规模冲突的目标，而在这样的大规模冲突中，我们是不会——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在非洲问题上不搞“权宜之计的交易”

问：依靠沃斯特政权来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而同时又谋求它帮助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这样做，对美国来说，是不是自取失败？

答：我要说，不这样做，那才将是自取失败。如果你奉行我国曾一度奉行过的那种政策，即以在南非支持沃斯特为代价，去争取他帮助你在罗得西亚实现变革，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在使这种冲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更激烈的和更持久的阶段。

人们必须做的是，相当迅速地设法解决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当前问题，与此同时，把这件事同南非本身的社会、文化和种族现状的逐步改变配合起来。

我们根据自己国家的经验，体会到要对社会重新进行各种安排，特别是当这些安排牵涉到种族关系时，那是极其困难、极其痛苦的，并且是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实现的。

我们还知道，一旦这个过程开始，最好是通过表扬，肯定所做的事和鼓励它进行得快些等方式去支持它，而不是因人家未在一夜之间改变过来，就拿枪对着人家的头部或给予一顿责骂。

所以，我们不准备支持种族主义。我们不会保护种族隔离的做法。我们不会进行一项权宜之计的交易，由于它的权宜性质，它只能产生明天把战场从罗得西亚转移到南非的结果。

（摘译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7 年 5 月 30 日）

五、美国和欧洲

一

自从欧洲崩溃以来，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维也纳—凡尔赛—波茨坦：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欧洲的世界秩序不幸的没落。

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政治家们在海上英国与欧亚大陆俄国的关键性援助下，挫败了拿破仑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陆体系的尝试之后，曾经谋求恢复欧洲的均势。1815年，仍然是欧洲政治家的才能，解决了欧洲的帝国问题，从而调整了世界权力结构。

在凡尔赛会议上，俄国被排斥在外，欧洲政治家们与民族自决的新势力进行了斗争，并力图限制德国这个欧洲唯一最有生气的民族统一体的权力；可是，他们主要是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政治家造成的政治的和理想主义的背景下这样做的，这个政治家象征着美国势力进入欧洲舞台。欧洲再不能单独打它的仗，也不能单独建立它的和平了。

在二十五年前的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欧洲没有人出席。在被征服的欧洲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大陆强国（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后裔）和欧亚大陆思想体系的帝国（也是欧洲思想传播移植的产物）的对抗中，决定了这个前世界中心的前途。尽管在波茨坦会议上，一些最热烈的辩论是那个

战时英国领袖的个人贡献，但英国的出席——原先是代表一个海外帝国的——在当时却已成为美国势力的附加部分了。

一个新的战后欧洲世界秩序从此出现了，但欧洲本身却是无权的、分裂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均衡状态的改变，几个世纪来事实上一直是所谓世界权力中心的欧洲消失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生气的大陆被瓜分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两个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非欧洲的权力中心。

直到今天，欧洲实际上脱离了世界政治。在社会经济水平上，它的衰落已经停止，而且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基本的政治现实，仍然和二十五年前欧洲城市成为废墟的日子没有根本的区别。政治的复兴还赶不上社会和经济的恢复，欧洲仍然需要决定它究竟是重新谋求扮演一个世界的角色，还是想要成为一个较大的瑞典或一个较大的芬兰。

在导致1815年作出那些安排的历史环境和围绕1945年波茨坦协定的那些事件之间，存在着某些富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在经过差不多二十五年实际上是连续不断的战争以后（由于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新挑战及其后来在拿破仑身上的体现，而使战争变得更加激烈），终于商定了几个大国之间的和平。提出权利要求的三个主要帝国之间，如何通过使各帝国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方式来瓜分波兰，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所以能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主要是因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均势体系由于各方协商一致而得到了加强。

同样，在1945年德国分裂之前也有一个战争和政治不稳定的漫长时期。可以把1914—1945年看作是包含着早先的安排逐渐崩溃（不但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崩溃），以及欧洲内部一些补救办法一再失败的年代。那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以外力造成德国的分裂——欧洲也随之分裂——而告终。新的体系已经持

续了二十五年。它对维也纳会议所创立的体系来说，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的比拟呢？

二

欧洲分裂局面的稳定性——表面看来由于苏联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欧对美国兵力的依赖似乎已很明显——是靠不住的。三项基本因素说明不是那么回事：(1)欧洲人不喜欢欧洲分裂局面稳定下来。此外，在欧洲一些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性可能爆发出来，使正在加速的政治变化的蔓延过程突然发生。(2)欧洲的分裂基本上取决于两个起分裂作用的大国是否稳定，而那种稳定性无论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或者从它们内部的政治状况来看，都不能认为是不成问题的。(3)基本意识形态的一致是不存在的，从而使每一方——由于它与另一方相对抗——都否认欧洲现有安排的合法性。

虽然欧洲人自己对于所需要的补救办法有分歧，但是，他们对于依赖别人的状况都有共同的不满。这种不满，对一个法国人和对一个波兰人是同样确实的；事实上，那位最明确地表示这种不满的戴高乐将军在东欧所以那么受人欢迎，原因就在于此。而且，欧洲各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从工业阶段走向电子技术阶段的转折点，因而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它们不可能单独地作出有效的回答。欧洲统一的必要性和客观需要性已被人们广泛地承认——东欧和西欧又都同样如此。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涉及当前欧洲社会和政治局面的明显地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西欧，富裕和发达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经济秩序尽管在物质上是令人满意的，

却没有能博得哲学信仰日益淡薄和动摇的个人的绝对忠诚。与此同时，多元的和自由的政治秩序确实已为群众所接受，而一些革命政党却没有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在东欧，虽然比较贫困，但社会主义的福利观纵然有缺陷，总的说来，似乎被看作是比较可取的社会组织方式；可是，对照之下，产生那种社会秩序的政治制度却受人鄙视。那种制度还是依靠高压统治和审查制度过日子，更不用说外来势力的直接侵入了。①

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不可靠状态，容易受到这样一些事件的预料不到的后果的冲击，例如：铁托的去世，由此造成的南斯拉夫的政治斗争，以及莫斯科受到诱惑而企图恢复它对1945年欧洲分赃以来曾落入它手中的那个地区的影响。分裂的德国(更不用说柏林)同样仍然是一个潜在的产生纠纷的地区；东德的埃尔富特市居民给勃兰特总理的欢迎，明显地反驳了所有那些人的设想，即认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通过强制手段，制造出一种关于民族同一性的特殊观念。同时，意大利有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它会变成北约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变成一个政治倾向甚至对外倾向都不明确的国家。总而言之，欧洲本身并不是平安无事的。②

可是，两个起分裂作用的大国也不是平安无事的。美国对它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不明确；事实上，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

① 这种事态为较有远见的东欧共产党人所坦率承认；波兰的W·比恩科斯基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的发动机和制动机》中(巴黎，1969年)差不多就是那么说的。

② 一个苏联裁军问题的专家最近把欧洲描绘成处于"亚稳定状态"，这是从化学引伸出来的一种比拟。"这意味着最微小的干扰就足以引起一种极其动荡的反应状态。"这似乎是一种恰当的比拟。(参阅L·贝齐门斯基："一项泛欧洲的任务"，载《新时代》，1970年7月3日，第3页。)

从全面的意义来讲，苏联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却一心追求世界的强权，而美国是否配得上做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呢，它今天还显示出许多靠不住的迹象。我在别处已详细论述了当前美国困境的性质，证明美国正处在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困难的但可能是创造性的过渡中。① 但是，不管我的分析的价值如何，对欧洲人来说，当代的美国无疑是一个不大靠得住的保护者，是一个不大负责的伙伴。

苏联同样地面对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可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不利的影响。与美国的过渡相同，苏联国内情况是，它的政治制度对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显得机能失调。苏联的政治制度本来是使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工具，但由于官僚机构方面的僵硬，和思想方面的教条主义，这种政治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现今革新所需要的那种科学技术创造力的障碍。这种状况正在孕育着一种政治危机，而且由于官方力图压制它的公开暴露，使这种危机更为严重了。同时，中苏冲突给苏联带来了持久冲突这个无法摆脱的恐惧，冲突的严重程度比美国痛苦地卷入越南可能大许多倍。这种恐惧就象苏联与美国的敌对那样，也促使在防务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这不但增强了更僵硬的教条主义分子在国内的影响，而且扩大了苏联在国际上卷入的范围。因此，苏联的稳定或克制都不能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与 1815 年不同，基本的共同一致是不存在的；相反，坚持现有安排的这些大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彼此竞争的。那种竞争是现实的、直接的，而且一点也没有减少。因此，这两个大国

---

① 《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70 年。

继续分裂欧洲，未必是因为它们双方都想要分裂这个大陆，而是因为这种竞争使它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三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和俄国在哲学上的差异，使这两个大国中的每一方和欧洲保持着颇为不同的关系。虽然它们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欧洲的分割，但是总的说来，美国对欧洲的关系一直是有所改进的，有创造性的，甚至是革命的；苏联则一直是保守得多，甚至是反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个美国人完全有权利为之感到骄傲的事实。而且，这是和当前政策问题有关的一个因素。

美国首先通过马歇尔计划，而且在整个战后时代，通过一贯支持和鼓励欧洲统一的运动，始终不渝地力求使欧洲恢复它以前的庄严。美国人已广泛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统一的欧洲即使有可能(事实上现在越来越是这样)成为美国的一个经济上的对手，也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较大的贡献。无疑，大西洋世界共同的思想上和哲学上的传统，对于美国期望和确信欧洲的统一大有关系。同时，美国的社会习俗、教育方式和组织社团的方法对西欧已具有非常强烈的影响，正在使欧洲既有的行为方式现代化甚至革命化。

相反，苏联在欧洲的出现，一直是真正传统的帝国主义和意识形态上强行控制的结合，目的是为了在它控制的国家里制造一些苏联式的复本。过去苏联坚持向西扩张它的国界，曾经占领芬兰的一部分、波罗的海国家的全部、战前波兰的一半以上、战前德国东普鲁士的一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苏联西面的每一个邻国，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遭受

领土的损失，使苏联得到了好处。

此外，苏联在整个战后时代不但拚命阻挠西欧的统一，而且竭力使受它保护的国家处于明显的卫星国地位，不许这些国家之间有任何合作和结合。无论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只有在苏联直接的因而也是占压倒优势的参加下才得到许可，这就明显地确定了莫斯科成为主宰一切的伙伴。通过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东欧国家与欧洲其余部分的分离最显著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既不打算切断与莫斯科在政治上的联系，也不打算切断安全上的联系，但是它的确企图使它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自由化，以与它的根深蒂固的西方民主传统相适应。

当前，顺大流的做法是：或者谴责美国政策目光短浅，或者至多说它在道义上同其对手的政策毫无二致，在这种时候，指出以上这些差别可能不合时宜，但基本的事实是，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总的特点是从根本上帮助欧洲恢复健康和活力。因而，这是一种有见识的为自身着想的政策，执行得很有力，也是具有创见的。

然而，今天在某些美国人当中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在欧洲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有些人极力主张在军事上脱身；另外一些人要求采取"低姿态"，所根据的理由正如尼克松先生在他的年度咨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就是美国由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转变为更加名副其实的伙伴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美国因为专心于国内事务和越南冲突，它对欧洲的政策已经越来越带有消极的性质。对西欧人来说，这种政策最多只是一个提供"精神按摩"的东西；把北约组织会议看作是美国继续承担义务的庄严保证，但却没有很多政策内容。对东欧人来说，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尼克松先生的布加勒斯特之行只有象征性的用处，但是他

的政府或者约翰逊政府，都没有为实现美国总统在1966年10月演说中强调的全欧更紧密联系这个更具有挑战性的想法采取行动。在实质性的问题(例如全欧会议问题)上，美国简直是裹足不前的。

所有这一切已促使欧洲人对美国在欧洲的作用感到忧虑。由于美国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和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向全世界介绍对美国国内困难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看法，由于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迫使美国政界不得不予以较大的注意，由于美国经济呈现种种紧张的迹象，以及由于越南战争在更普遍地助长孤立主义情绪的同时，继续吸引着美国决策者们的注意，因而欧洲人正逐渐地对于美国的保证更加怀疑，而且对于美国的意图感到更难以捉摸。尽管欧洲对于美苏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搞新的霸权交易所感到的恐惧，已由于美国巧妙地在每一个谈判阶段向它的盟国进行情况介绍而有所减轻，但是对于一次新的雅尔塔会议的余悸，代替了对美国突然脱身的恐惧而继续存在。

其结果无论对美国或者对欧洲都是没有好处的。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没有欧洲，美国就会由于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活动感到幻灭而转向国内，从有时出现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变为自我中心的犬儒主义。没有与美国的紧密联系，西欧的政治独立就不大可靠，在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双方合在一起——尽管它们都有缺陷——就体现出迄今为止人类所发展的最公平、最自由的民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西方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一句话，就是文明——取决于美国和西欧在组织国际事务的新结构中紧密合作的能力如何。

因此，正如尼克松先生曾经说的，美国“不能从欧洲脱身，就象不能从阿拉斯加脱身一样”，这是确实的。但是，既然如此，美国就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的欧洲政策。没

有共同目标的亲密关系，就不再是亲密关系，而变成一种短暂的关系。诚然，尼克松先生的比拟尽管未必真正是对欧洲阿谀奉承，但却强调了美国和欧洲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使双方有责任对欧洲前途所面临的各种主要问题作出共同的努力。这首先就得把力量集中在怎样去纠正欧洲的分割局面以及怎样去确定欧洲在国际上起什么作用。

四

东西方争论远远没有结束，甚至远远没有暂时休止，尽管这恰恰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制定者想要传播的印象。

捷克事件证明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脆弱性。领导人员缺乏深厚的政治基础，最高层的意见分歧，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以及人民对斯大林主义者统治的普遍不满，很快地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挑战，就象早些时候在匈牙利、波兰和东德也曾发生过的那样。但这并不是说东欧的民主演变就不可避免了；苏联的势力和大多数东欧国家有组织的民主传统的相对软弱性，都倾向于起着防止这种演变的作用。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是，现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成功地移植到东欧的社会有机体中；这种“制度抵制”的现象，主要根源是民族主义，但是由于这种感情很深，莫斯科要把它完全压制下去，是困难的。

某些西方观察家曾经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使它对捷克的占领正式化了，这意味着今后东欧的所有变化，必须与莫斯科的变化亦步亦趋。这里面有某些真理，但这个结论是夸大了。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必须把东欧和俄国都包括进去，以免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正在努力把东欧同俄国拆开，

并使它跟俄国作对。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断定今后西方的主动倡议必须仅仅针对莫斯科提出来。这也不是说应该避免去鼓励东欧的民主演变、更大程度的独立以及同西方密切合作，以免促使一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出现。采取这种态度，就是作出一项自我应验的预言；不仅如此，这也意味着默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

应该记住，莫斯科制定这个主义，是在它的声誉和国际地位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克里姆林宫并不急于要重演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武装入侵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场面——譬如说，在罗马尼亚或波兰。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领导人竭尽一切力量，使西方的搭桥政策成为不可信，并加以阻止，而且说服西方单独跟莫斯科打交道。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以及苏联模式的科学生命力的感染力量，都衰退了（正如C·米洛斯在其“被控制的思想”一文中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在某些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弄垮了的东欧人中间，有一个时期，这种号召力是无可否认的）。这一切使苏联领导人更急切地要确定，所有东西方关系必须通过莫斯科。

毫无疑问，苏联领导人由于西方对东欧人的吸引力的复活而感到特别担心，这种吸引力的复活甚至在统治东欧的较高级权势人物中也感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好些东欧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经济专家，从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一个使东西欧对立的传统裂口得以合拢的机会：他们指望通过迅速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来建设一个在道德上和社会经济上甚至比西方更优越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中占优势的基调是社会改革，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以及甚至对西方的藐视。

现在这种乐观主义已是过时的东西了。尽管作了一切努力，东欧人认识到，他们仍然落后于西欧；西方正在跃进到电子技术时代，而他们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政治制度，却正在阻碍其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工业化时代，钢常被作为工业发展的标志；而在今天，可以把电子计算机作为同样的标志。下列数字特别具有启发性：①

1969 年年底电子计算机分布情况的比较

美国	70,000
日本	5,800
西德	5,750
英国	5,600
法国	5,010
苏联	3,500
意大利	2,500
加拿大	2,400
澳大利亚	900
荷兰	850
瑞士	800
东欧	750
非洲	750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忧虑日益增加。东欧人同苏联人一样，正在着手输入工业技术来作为一种短期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东欧人，承认列宁主义已变成过时的教条，它极少谈到关于工业化后的电子技术时代在心理上和科学上的各种新的难题。当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 1970 年 7 月号召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时，他是表达着人们所广泛持有的一个观

① 根据的资料来自《工业技术评论》，1970 年 2 月；《欧洲评论》，1970 年春季号；V·巴锡尤克，"工业技术与世界强国"，载《外国记者协会要闻专辑》，纽约，1970 年；以及 R·V·伯克斯，《技术革新与共产主义东欧的政治变化》，兰德有限公司，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1969 年。

点，而这种现代化是不可能从官僚主义的正统观念堡垒中产生的。

苏联领导人尽管在东欧问题上感到忧虑并处于守势，他们对西方的态度却一直是积极的——也许部分地是为了弥补这一弱点，而部分地也肯定是为了利用美国的消极状态。他们的政策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情况是苏联政策各部分互相冲突的目标中所固有的。这些目标是：巩固对东欧的控制，争取西方承认这种控制，获得西方技术，诱使西德采取更加孤独的态度，以及保持对柏林的优势。因此，一方面，苏联领导人积极地提倡所谓"欧洲安全会议"，希望因此而赢得西方对现状的正式承认，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倾向，又促使他们力图利用这项策略，以削弱西欧的团结。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一直是竭力主张东西方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可是另一方面又一直猛烈抨击东西方的和平接触，并且创造了"和平的反革命"这种煞费苦心的理论，来为他们竭力限制知识和文化上的更紧密联系作辩护。一方面，他们谋求得到西方技术革新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使西欧更加依赖苏联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

但是，无论表面的矛盾如何，苏联政策的内在逻辑仍是首尾一贯的。苏联在拒绝西方跟东欧接近的同时，还试图阻止欧洲在世界地图上重新出现。一个散漫的、分裂的、逐渐地但不是显著地与美国疏远的欧洲，一定会变成一个瑞典式的地区——其政治倾向本质上是西方的，但不活跃，而有"激进的漂亮外貌"，这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并不坏；更好一点的话，则是变成一个芬兰，它对于薄薄地蒙上一层面纱的苏联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是直接屈从，却必须保持敏感。在中苏危机的威胁日益增加和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苏联追求这项目标必须谨慎从事。的确，只有通过克制，才能促使美国同欧洲疏

远，而鲁莽的行动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因此，有限的和平共处，最能为苏联在东欧和西欧的利益服务。

上述分析着重指出，美国对东西欧关系起抵消作用的卷入仍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积极的卷入，就会发生真正的危险，如果不那样做，那么即使是一些完全可取的主动倡议，例如波恩的东方政策，就会失败，或者更糟一点，反而会使西方分裂。欧洲问题，甚至德国问题都太复杂了——而且正如我们已论证的那样，还包括世界权力的一次非常深刻的历史性改变——不是一些中等规模的欧洲大国单独努力所能解决的。

苏联领导人似乎比华盛顿更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已加紧努力，要通过双边谈判，从波恩获得他们的全部要求（因为不然的话，东方不得不就这些要求同西方进行谈判）：在法律上承认东德，承认东方边界，还有安全保证和贸易利益等。在单独对付莫斯科方面，波恩已大幅度地改变了它的态度。过去，它力图通过自由选举求得重新统一，并使重新统一的德国能自由选择它的联盟，而现在，它正力求在德国人的全面接触方面和进入西柏林方面取得某些进展（这是莫斯科往往到后来可以收回去的东西），以交换它在事实上承认或者不久在法律上也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而言之，波恩已经从以最小代价去达到最大目的，改变为以最大代价去达到最小目的了。

更加扰乱人心的是，有些与东方政策有联系的德国人，竟悄悄地向他们的西方朋友承认，西德这种主动倡议的真正动机，是由于西德人对美国的坚定性和承担义务的信心日益下降。西德的一些最高级领导人在访问美国归来后，已向他们的一些朋友承认，他们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感到沮丧，和对美国的政治方针不信任。他们同莫斯科接近，部分原因是为了通过双边谈判来加强西德的安全。虽然这也许不是主要的动机，但看来这确是德

国某些主要决策者所共有的看法。

诚然，承认奥得-尼斯河界线，和废弃慕尼黑协定，可以增进德国同东欧的关系，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今年8月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极其有助于消除复仇主义的德国的形象，虽然，如果联邦共和国通过同波兰签订双边协定，承认波兰边界，那还会更好些。在德国-苏联协定方面的这种做法，确认了苏联所宣称的关于苏联是东欧各国领土完整的主要保证人的要求。但是，关于欧洲复兴这个更大的目标，只有在更大的均势基础上，在更广泛的方面才能取得进展。西德有力量使德国的分裂合法化，并满足苏联对于西方工业技术的渴望，但是单靠它自己，不能使东欧返回到欧洲的怀抱，甚至也不能明显地促进德国人民重新联合的进程。的确，由于东方政策是在有限的国内支持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可能在德国内部在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引起分裂，而且给西欧的统一带来消极的后果，尤其是如果东方政策的成功证明与它的失败没有多少区别的话。

因此，华盛顿恰当的方针决不是警告西德不要行动过速，以致使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易于同勃兰特对抗，或者在警告遭到忽视时对西德这种努力公开地表示为时已晚的同意，而是应当在制定西方关于东西方关系的主动倡议中起积极作用。这类主动倡议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提出东西方对欧洲的主要问题进行会谈的一个全面的议事日程，也许甚至可以使一些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也参加讨论某些与它们比较有直接关系的议题。这就是大多数欧洲人，既有东欧人也有西欧人，可能希望美国去做的事情。实际上，只有莫斯科，或者某些有拉巴洛思想的德国人，和若干残余的戴高乐主义者，宁愿美国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也反对西方对东方关于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作出主动反应。这种消极状态已经使苏联在整个

1969年和1970年初期，能够实行它的欧洲政策，能够协调它在东西方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而不必害怕来自西方的肯定的答复会迫使东方认真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东西方争端上——当然它从来也没有象外表上看来的那样真诚过。

由于美国在其盟国逼迫下于1970年采取行动，西方终于在5月里开始向东方作出反应，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举行关于在西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共同均衡裁军问题的探索性会谈"。这是西方向前迈出的一步，然而是胆怯的一步。它仍然没有涉及旨在把有关东西欧关系的一些突出的争端都提到日程上来的一项更广泛的政治上的主动倡议。

然而，要跟莫斯科的政治动议进行较量，那种更广泛的主动倡议却是必要的。为了强调美国对医治欧洲大陆的分裂状态继续承担义务，由美国主动、积极地参与制定这样一种主动倡议也是必要的。但人们不应抱有幻想，因为这样的主动倡议不可能解决问题。也许东方想要谈判，也许他们的建议就是吓唬人的。如果是后者，这种恐吓至少要受到谴责；如果是前者，那将成为一个长远过程的起点，这对于所有的有关方面都有利。

西方的议事日程可包括如下项目：(1)早已在1970年5月提出的共同裁军的建议，对于讨论这个建议，东方已作了肯定的回答；(2)建立一个北约-华约联合委员会，或者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以便监督最后签订的安全协定的执行，甚至提出其他的、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倡议①，从而配合美苏双边会谈的进展；(3)建立一个常设的东西方政治协商机构，例如外交部副部长一级的机构；(4)旅行、文化和贸易等关系的自由化和合法化，特别

① 这是在我的《东西方和解的机构》一文中提出的（《外交》季刊，1968年1月）。

要明确地把关于进入柏林的更正式的安排包括在这个范围内，也许四大国已在别处对这些开始进行了谈判；(5)重申各个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干涉，特别是不受武力干涉的原则，这种干涉的特权是苏联通过勃列日涅夫主义所主张的；(6)扩大科学技术的合作，但以其他问题也取得进展为条件，因为不然的话，西方将会不断满足东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望，而在政治的紧张局势方面却没有任何相应的缓和。

无疑，这些建议可以加以修改或加上其他建议。这里所提出的议事日程，可能部分地包括东方提出的建议(尤其是关于贸易和工业技术方面)，但仍然超出了它的建议。同东方就议事日程进行谈判，本身就是谈判过程的开始，因而也就包括所希望的东西方对话的开始。"过程"这个词，是个关键性的词。在向东方提出更广泛的谈判过程的建议时，西方所应当期望的不是立即达成协议，而是长时间的对话。最初基本上是探索性的，随后才有较多的谈判。

同时，这种谈判，对纯粹属于美苏双边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比较专门地涉及德国问题的(也是在双边基础上的)东方政策，以及对四大国关于柏林的会谈，将是一种补充。这种谈判可能使欧洲人有一种更大的卷入的感觉，而这种卷入是以均势为基础的，不至于使欧洲人担心美苏达成双边协议，或使德国人担心被丢在一边而单独地去跟更强大的俄国人一起决定他们的命运。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东西方谈判的保护伞，可能使西德人在决定同东方谈判的步骤时，有更大的灵活性。目前，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而且他们也不容易将他们德国人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同那些影响其盟国利益的问题分开。① 这些盟国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方面，应当效法波恩，但是，

波恩也应当有机会来校准自己同更广泛的东西方谈判的进展有关的行动。

西方对裁军问题采取某种程度的比较灵活的态度，可能有助于西方提出一项更广泛的政治性的倡议。裁军问题非常复杂。把它作为西方的首要的或重要的主动倡议，也许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做就把一个军事问题摆到一些政治问题之上了，而它的解决（除了军事技术的考虑外）首先仍然取决于政治上的进展。此外，从苏联的立场来看，东欧的政治状况，比西欧相应的政治状况，要不安全得多。苏联占领军一旦撤退，它们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作为开始谈判的开场白把军队问题提出来，这在策略上是明智的，特别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引起整个欧洲注意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比较大的建议方面，也许会证明双方同意某种象征性的裁军是可行的，这样的裁军首先是为了改善讨论更基本的政治问题的气氛。因此，西方在还没有对进一步均衡裁军进行必需的系统的研究的情况下，建议双方初步进行某种象征性的裁军，譬如说，美国和苏联各自从德国撤出二万名士兵，可能是可取的。

东西方问题，有时是作为一个承认或不承认现状的问题提出来的。也许一个比承认更适当的名词将是“合法化”。正式的承认，会被一方认为是为时已晚的胜利，而某些盟国，特别是联

---

① 举例来说，多年来，美国一直从德国境内操纵着无与伦比的最有效的工具，用西方的以及特别是西德的官方观点，去阻挠东欧人和俄国人的思想灌输。象自由欧洲电台或自由电台这样一些工具的使用，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使公众而且使正式共产党人态度发生变化方面一直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工具代表着西方的共同利益，是不会通过双边交易被出卖的。

邦共和国，则可能认为这是背叛了很久以前所承担的义务。甚至也不一定能够说所有东欧人对此都会感到高兴。但是东西方关系包括涉及两个德国关系的合法化，可能对渐进的演变提供一个基础，其目的是使欧洲各国人民，也包括德国人最后归于和好和重新联合。

重新联合，应该始终是美国政策的目标——不仅口头上，而且要承担义务来表明。这项政策虽然遥远，但对于欧洲的最后复兴却是必需的。这也是大多数东欧人非常渴望的事情。因此，美国表明积极参与用和平方法消除波茨坦会议的遗害，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且与它自己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五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欧洲的复兴需要它的东、西两半部重新联合。从比较短期来看，西欧持续的一体化及其与美国的紧密合作对它最有利。这两个目标之间并没有矛盾。一个脱离美国的、不统一的西欧是不可能实现欧洲重新联合的；莫斯科会注意这一点。通过逐渐互相密切联系的过程，欧洲的重新联合最后是可以达到的，这可以从一种稳定的均势基础上加以引导，并由西方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活力来加强它。

常常有人争辩说，莫斯科不会允许一个更加统一的西欧——更不用说西欧与美国紧紧联结在一起——去发展与东欧更密切的联系。然而，所谓"允许"并不是问题所在。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那样，所涉及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它是渐进的，就不可能轻易地，也不可能有效地加以拒绝——而且这个过程只能由具有吸引力的、越来越统一的西方来促进。

而且，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近几年已经看到美

国在欧洲的经济投资和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尽管就关税来说，美国与西欧有种种困难问题，甚至尽管有进行关税战的威胁，但是类似一种大西洋超级市场的东西正在发展，从而使美国不能从西欧脱身。科学合作、文化教育联系、日益加强的通讯往来和旅客横渡大西洋活动，所有这些方面的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加强着这种发展。

这样，美国在欧洲的军事上的存在不应该被认为主要是使波茨坦协定和冷战永存下去，而应该被认为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一种反映。当然，从美国的观点来看，要是西欧人在他们的防务上承担更大的义务，就会更好些，但是老是比较美国与西欧的防务费用，以致有损后者的声誉，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姑且不谈美国安全利益涉及全球范围以及欧洲近来的崩溃这一历史事实，也应该考虑到在相对水平上东西方之间非正式的均衡状态已经存在：美国和苏联的防务费用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大致一样，而西欧和东欧的比例也是如此（在1968年，美国和苏联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三；不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其他北约组织的国家从百分之二点三到百分之六点二不等，而其他华约国家则从百分之二点九到百分之五点七）。西欧大大加强它的努力也许会首先涉及西德部队的增加，这就可能促使苏联要求东欧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其前景不一定有助于东西方和解和重新联合的进程。

当然，就美国驻欧兵力的现有水平来说，并不是特别不可思议的。要害的问题是要避免由于象“曼斯菲尔德决议案”那种长期存在的问题所引起的捉摸不定和模棱两可的情况。有时看来好象美国参议院一心想把美国对其盟国所承担的义务搞到最大限度地令人难以捉摸。真正的问题是财政问题。尽管对美国驻欧部队的实际费用的估计各不相同，看来实际数字每年大约

为三十亿美元。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供的一份专门研究报告说，虽然“不可能用数量精确地表示美国在海外的防务支出和收入对美国总的国际收支差额所产生的最后结果”，但是在记入西欧国际收支对照表的美国防务支出和美国用于西欧的防务支出方面有相当大的亏额。

假如从心理上和财政上来考虑，更可取的行动方针应该是西欧人自己提出一项关于美国部队的不变的最高限额——也许比目前还稍微低些——以交换长期的财政援助。不过没有一项正式条约，美国对驻欧部队水平所作的长期保证就不可能取得正式的地位。由总统作出一个保证，可能是仅次于最好的办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目前干扰着西欧与美国关系的那种捉摸不定的状况。

西欧共同对防务作出努力可能成为现实，特别是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了或者那怕只是朝这方向前进的话。在这一点上，核的问题又可能变成尖锐的问题。然而，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达成某些协议，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赞助西欧人通过英国和法国合伙制造核武器以建立它们自己的战略部队，看来不大可能，而且也许甚至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超出原来的一些安排，或者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促使苏联在象地中海这样的一些地区变得更加活跃，那么美国支持欧洲在战略领域的防务努力就可能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此外，有些想法也许应该提出，以促进现有美国部队和西欧部队有更大程度的结合和轮换，也许其中美国部队在单位大小的水平上要比现在所有的小些。这种结合会促进合作精神，即同志关系的出现，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同志关系在大西洋两岸都可能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的确，为了强调美国和西欧的相互依存，也可以把一批批受过高级训练的欧洲安全技术

人员派到美国大陆去服务，以作为西方共同防务努力的一部分。

与苏联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竭力使东欧顺从并使之同苏联经济一体化相反，美国则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虽有同盟关系却是独立的实体，而一直支持它的发展。这种支持反映了一种具有比较广泛历史意义的判断，也就是说，即使从比较短期来看欧洲的复兴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可能带来复杂的情况，但对于世界来说却是可取的。即使双方都有善意和远见，如果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税战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巩固和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尽一切力量使关税战局限于经济方面。

有两个领域为新的倡议提供种种可能的机会。第一个领域涉及科学和教育的合作。如果西欧和美国将来更紧密地协调它们的各种教育改革方案（这些方案部分地是由近来的动乱促成的），双方都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虽然大西洋两岸的教育问题是有差异的，但是不能得出结论，说那些补救办法——以及改革的总方向——会是根本不同的。恰恰相反，看来西欧和美国都必须对现代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进行再检查，就是需要从哲学上对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进行充分思考的那种重新考虑。

更确切地说，双方都可以从教育方面的更好合作，从扩大学生和教授的交换以及从学术条件、学位和学衔的日益标准化中得到好处。应该作出审慎的努力，从高等教育机关着手，创立一个共同的教育机构，它将在哲学上和技术上对双方都有利。

至于联合进行空间探索，情况尤其是这样。关于欧洲人参加美国空间探险事业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一些欧洲人参与"航天飞行"的计划是一件可能的事。如果空间探索不至于变成美苏独占的领域，可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就多得多。美国月球飞行在欧洲所引起的巨大兴趣和热情，表明了欧洲有动人的潜力

可资利用，也说明欧洲人毫无疑问地可以在财政上和科学上对空间研究作出很大贡献。作为起促进作用的第一步，可以把一些欧洲人作为宇宙飞行员纳入美国空间规划之内。

可以提出倡议的第二个一般领域，涉及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这反过来又对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都提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尼克松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把北约组织的注意力集中于不发达世界所关心的事情，但是，据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北约组织应该把力量集中于西方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既然北约作为一个联盟已经积极地起到了防止战争的作用，现在它就能够设法去创立一个新的东西方安全机构。这个任务是够大的了，再把各种新问题加到北约身上，并不会提高它在政治上的声望或效力。

一个新的更广阔的途径是需要的，这就是创立一个发达国家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能有效地致力于人类所面临的有更大利害关系的事情。除了美国和西欧之外，日本应该包括在内。把它包括在内，不但对日本而且对西欧都会有好处，使双方都感觉到参与了世界规模的一些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从它们自己的成就和问题中产生的。组成一个代表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委员会，连同各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以及若干小规模的常设机构，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应该把这样的一种委员会同过去偶尔有人建议的理事会混淆起来；它主要是协商机构。只有通过协商和讨论，才能使共同的观点以及最终使共同的目的具体化。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方面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在各种思想越过大西洋而进行积极交流的时候，是在杰出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敢于大胆地思考和创新的时候。今天，又需要一个论坛，但是在规模上要与我们所关心的世界大事相称。当欧洲还是支离破碎的时候，西欧人从大西

洋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跃进，让欧洲人和日本人同美国人一起确定共同的世界前景，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骤。

美国能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吗？它能主动采取本文所建议的各项措施吗？它的国内种种问题确实是障碍，但是更加严重得多的障碍是它的某些领导人明显地丧失了信心和远见。如果可以说当代的苏联领导在官僚机构方面是庸碌无能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垂死的，那么美国的权力机构似乎在思想上是麻痹的，在政治上是优柔寡断的。然而，这个国家，从整体来看，正在探索着新的目标和国内外需要达到的特定理想的明确概念。复兴欧洲，就是维护和扩大世界大家庭中已经达到最接近于建立一个人道的、正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那一部分。美国恰恰与欧洲有着关于法律和个人自由的某些共同的概念。除非美国继续积极地促进欧洲复兴的广阔前景，否则它就谈不上有一项外交政策。

（摘译自美国《外交》季刊，1970 年 10 月）

六、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和变动

结论与建议

广义地说，这项报告①中出现的日本，是一个处于大变动中的国家，而当这种变动的进程加速时，破坏性可以变得越来越大。在社会方面，日本正从因循守旧走向现代化。在政治方面，日本正从建立在一个由权威和小集团主义构成的颇为封建的模式上的民主代议制走向领袖与群众之间有比较直接联系的人民党的关系，而且比较强调个人的政治。就社会准则而论，正从由自我克制的纪律所加强的、专心致志的共同目标，走向比较复杂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一套目标，包括更多地强调民族自尊心和社会利益。在国际方面，正从依赖的姿态走向独立自主。

此外，从外部冲击日本的种种事物，几乎都在削弱那些在传统上使日本内部团结一致的各种力量。越来越多的对国际事务的卷入，和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都在冲淡着公认的忠诚，刺激着不断增长的享乐主义，改变着日本人的政治作风。日本的社会恢复力是很大的，因此，许多外来的影响都被冲淡或者被吸收了，但是这些新的影响在旧事物中逐渐发展成为过重的负担，因而意外的突破是可以预料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使得日本具有似

---

① 指《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和变动》一书，此书原为作者关于日本问题的一个报告。——译者

稳定又不够稳定的性质。

在用比较具体和概括的方式列举我们的结论之前，要提一个一般的论点：自从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之前日本因与外部世界对抗而受了创伤以来，日本人的行动大多是出于对外部世界反应的需要。这并不是对日本人的行动提出一种机械的外部决定论——因为日本文化的传统、日本人民的活力以及日本社会的结构，显然在日本人的一切行动上都是决定性的既定因素。我们要论证的是，这些因素由于外部的冲击和挑战的力量而被刺激和推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模仿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出于美国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日本的战后历史则是美国培育的。日本人在七十年代的行动，可能深受他们对美国及其全球行动怎样理解的影响。

固然，一切国家都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过，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日本似乎更加经不起外来事物的冲击。它的内外行动都更多地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正是这种对外来刺激的敏感性，以及从地缘政治学方面来说，它的受到极大限制的和极易受到攻击的位置，不能不使那种认为日本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日益普遍的看法带上某种局限性。在某些方面，特别从日本的民族活力和经济力量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也可能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然而，从它真正的内在自信心（即对于一个国家本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安全感），和从国内外行动的坚定性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直接控制的物质财富（包括领土这样一些明显的资产）的角度来看——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利条件，并且非常经不起攻击。简言之，由于主观上缺乏信心而客观上又有所不足，它的经济成就，甚至它的预期的军事力量，都是脆弱的花朵。

让我们记住这三点一般的结论：(1)社会的似稳定又不够稳定的性质，(2)对外来的刺激的高度敏感性，(3)它的地位的脆弱性。现在再很简单扼要地说明我们的比较具体的结论，然后提出一些建议：

(4) 越来越多的国内社会偏见，很可能削弱，或者甚至分裂社会意见的一致性。

(5) 一次经济衰退很可能威胁日本的民主政治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二者都仍然是相当脆弱的。

(6) 今后五年中不大可能发生引人注目的向左转，虽然左翼的力量会强大起来，并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令人生畏的一个方面。

(7) 自由民主党将试图把左翼的国内政纲吸收过来，不过它本身将更不团结，也许必须通过结成联盟才能统治。

(8) 今后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再也不会有固定不变的事情了——更确切地说，在政权领导方面将有更加频繁的改组，甚至将发生某种政治混乱。

(9) 国内政治的一般情绪，很可能包含着某种正在发展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相结合的东西。

(10) 日本的经济形势很可能变得更复杂，特别是因为劳动力不足，高度的生态消耗，以及比较不利的国际环境。

(11) 经济上的某种衰退是可以料到的，最近五年中将迫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每年百分之八左右，而且以后也许还要更低一些。

(12) 尽管日本强调意见一致和集体负责，它在作出决定时的夸张作风，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能否很好地起作用，这是值得怀疑的。

(13) 在较少依赖美国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将力求作

出最大限度的选择和减少依赖性。

(14)① 由于缺乏一套连贯的民族目标，正在增长的民族雄心将受到挫折，不过总的趋势将走向某种含糊的民族主义的中立主义，而没有中立主义的口号或公开的民族主义。

(15) 让日本在亚洲担任一个重要角色，这样做是值得怀疑的，也是不可取的。

(16) 日本人对俄国的政策——尽管苏联加强了同日本的交往——将是冷淡的和自有打算的。

(17) 对日本来说，中国将继续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如果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发生明显的不和，中国至少在感情上将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对象，也将是日本内部严重的政治分歧的一个根源。

(18) 1975年对于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和日本的安全政策都将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日本在逐步采取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适应那时在安全方面可迅速作出更基本的抉择的。

(19) 如果国际形势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恶化，由于更加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特别是如果在此期间在某处被它的对手所羞辱的话）促使日本人承担自己的战略防务，那就会选择核武装。

(20) 因此，就美日关系来说，孤立主义的和保护(贸易)主义的美国，可能是最糟的伙伴，这样的美国既会刺激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又会刺激日本人的民族主义。

(21) 然而从理性上说，日本人和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的联盟基本上是可取的，并将力求通过必要的安排来保持这种联盟。

---

① 我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写的原稿，另有一个编列为十四号的项目(当时项目的总数是二十三个)，其内容如下："可以预料将对日元采取顽强的后卫行动，因为日本人不是在发生国际货币危机之前，而是在面临危机时才最后屈服。"

(22) 日本和美国关系中的三个根本问题(经济、安全、地位),都不是在一个双边机构内可以解决的。

在日本的未来，美国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事态变化的关键所在。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一直是开明的，而且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战后时期在1971年8月突然结束了,当时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以及在货币和经济领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把美日关系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双方现在都必须作出非常审慎的努力，去保护已有的成果和规定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这个报告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和日本对美关系这一点上）现在提出有关美国对日姿态的某些建议还是适当的。

第一项建议是很一般的。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对日本问题的理解和关心是不够的。美国关于日本的报道，还不如美国有关欧洲问题的报道,这是很不相称的。因此,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必须始终一贯地对日本的发展给予比较密切的注意。普通的日本人差不多每天都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看到关于美国的新闻，而美国人只有在某些紧要的事情发生时才阅读关于日本的新闻。的确，一个美国人阅读的西德新闻五倍于他阅读的日本新闻。美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也差不多有相同的情况,比苏联、欧洲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都要落后。这种情形造成了不敏感，而且导致愚昧无知，这同美日关系是亚洲范围内最重要的关系的事实是完全不相适应的。

在公众和学术界方面,都必须作出重要的改进,这些改进将要求日本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多年以来，美国一直鼓励和支持日本人研究美国(通过各式各样的花去大量经费的计划)。日本人在出资鼓励和支持美国人研究日本方面则一向是懈怠的。有些日本人显然甚至认为，不让外国人对日本了解得太清楚还比较好些。这种态度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来说是一个代价

很大的错误，日本人应当作出很大的努力，以保证和鼓励美国研究日本的广泛的计划，而不是去批评美国不注意日本。不这样做，就显示出如上文讨论中所提到的目光短浅和小国心理。

同这一点有联系的是关于气氛和象征的总的问题。非常不幸的是，尼克松总统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决定宣布他打算访问中国。日本人由于对国际地位很敏感，本来是要热切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不仅是为了抹掉由于艾森豪威尔访日之行流产而造成的污点，而且也为了强调美日关系在太平洋的突出的地位。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对于日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互访，需要做很细致的、注意到每个细节的工作，并且尽一切力量保证其成功。

第二项建议涉及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助长日本人关于他们在世界上的力量的自高自大感，或者使他们受到过分的阿谀，都是不正确和不明智的。日本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力量，是这个多样化的地球上的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和在许多方面值得钦佩的民族。然而，它不是超级大国，而且它能否成为超级大国也是有疑问的。事实上，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所作的努力——部分地是由它自己要成为超级大国的奢望所鼓舞的——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这会使均势的观念，克制的观念，以及日本在世界上担任一个重要角色时赖以指引的责任感都变得模糊起来。

相反，我们应当培养日本人的现实主义。在日本人的心灵中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趋向：尽管日本人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是极端现实主义的，但对地位的向往和竞争的冲动可能使他们易于失去控制。正是那种现实主义应当受到鼓励，并应为它提供真正的以及在感情上使它满意的出路。因此，把日本说成一个超级大国，而且鼓励关于日本获得核武器是不可避免的观念（通过预言的方式，这种预言逐渐变为愿望）是不可取的。相反，设法

为日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一个常任理事的席位可能要更好得多。对于这个席位，日本比法国和英国都更加有权利去要求获得。取得这个位置就使日本得以承担真正的和建设性的国际责任。美国的一个重要目标应该是：设法修改联合国宪章，使日本作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之一而在安全理事会获得席位。

以上所述都与地区责任的问题有关。正如我早已指出的那样，我对日本在亚洲担任一种特殊的角色的可取性，是表示怀疑的，特别是对亚洲安全的日本化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好处——不论对日本或者对美国——也是半信半疑的。既然亚洲人不希望这样做，日本人就不能这样做。对美国来说，鼓励日本人更广泛地参与保卫国际和平——例如在中东，日本人在那里有重要利益——比迫使日本人成为朝鲜、台湾以及甚至东南亚的保卫者，可能要更加明智得多。要日本承担一种建设性的和更加积极的保护全球安全的任务，最好的办法将是使它在保卫和平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这个职能在形式上可用个人"志愿兵"在国外参加联合国日本部队的方法（因为从宪法上说，自卫队是不许在日本本土以外服务的）。

中国的问题虽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却也是与地区问题有关的。吹嘘日本是远东主要的地区性大国，等于促使中日敌对。这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可能没有好处。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将对中美关系发生不利影响，而且使日本国内政治和中日关系复杂化。很值得优先考虑的是，作出某种努力，促使日美中三方就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后还有政治和安全问题，进行协商。这类谈判开始时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进行，最后可以变成比较正式的，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常设的协商会议。

另外两项建议提出了甚至更加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以概

括的纲要形式加以论述。其中第一项——这一项也就是第三项建议——是关于核问题的。据我看来，在这个时候或者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不应鼓励日本发展核武器，因为决定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将使日本这个国家发生深刻的分歧，甚至发生不能预料的国际后果。美国不会由此获得显明的利益。同时，积极的劝阻也会有不利的后果，因为这只会激起日本人的民族情绪。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鉴于日本人倾向于推迟作出明确的决定，并且要避免由于这种决定可能引起的复杂情况，对美国来说，采取一种不介入的、"核中立主义"的姿态乃是最明智的姿态。

然而，如果日本自己决定发展核武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种决定——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很可能是在一种多少有点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日本实际上会发展核武器，这一结论并不过时——的确远远没有过时。然而，要是它发展核武器的话，那么，美国通过直接的技术援助，而且——在日本实际上获得核武器以前，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也许还通过把目标对准日本的潜在敌人的关于核武器的所谓"双键"系统，去援助日本的核计划，这样做，可能实际上还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一则是，那时美国会比以前甚至更需要盟国，因而它如果积极地反对日本的决定，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再则(而且是更成问题的)，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占核优势的背景下，核扩散肯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在核均势(更不用说美国在核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背景下，核扩散便可能对美国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战略上和政治上的策划将复杂起来，对那时享有核优势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

当然，鼓吹美国援助日本的核防卫计划可能等于鼓励日本去发展核武器，这是我曾警告要提防的事情。这种前后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我的理由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

日本很不可能发展核武器；如果世界事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就很可能发展核武器——而在那个时刻，美国对日本的积极援助，将比我们前面讨论中略述的其他各种选择更为可取。在没有这种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人认识到，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将会使日本在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化（包括美日关系方面的不利后果）。这种认识是一个强有力的制止因素，增加了国内对作出这个决定的其他阻力。

同时，美国的明智做法是去改进美日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计划，减少在日本的比较明显可见的军事力量，并把力量更加集中在联合基地和保持紧急部署所需设施的高度准备状态。日本在财政上提供更为直接的贡献以保持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以及日本更加广泛地参加到战略设计的过程中去，这样做似乎也是合适的，这也许要通过高级军政设计人员的联合机构来进行。配备这些设计人员的目的应当是增进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行动是符合日本和美国的利益的。但是，这里的争论包含了一种无可否认的因果循环的论点：如果美国在日本继续有军事力量，就触犯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而且在美日关系中制造紧张；如果减少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就加深了日本人的不安全感，日本就更加需要拥有较大的武装力量，从而在其他地方引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新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双方能够尽量做到的，就是努力使它们的军事关系中逐渐发生的变化，同逐渐表面化的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协调起来。

就日本的安全来说，美国对以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群岛为基础的太平洋的海上三角的形成给予支持（也许甚至很不显眼地给予援助），可能也是明智的。这三个国家有某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和部分相同的安全问题。这种太平洋的海

上三角关系——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正式联盟，并有美国同它发生间接联系——可以成为稳定和更广泛的合作的根源，而不致加深对日本的优势的恐惧。

这就把我们引到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上来了。要仅仅在双边基础上，去适当地处理美日关系中的安全问题，地位问题，或经济问题，都不再是可能的事了。在未来的岁月里，安全问题将首先需要就整个区域、甚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战略趋向，把各种想法进一步大大地协调起来。这意味着一个对可能发生的威胁、意外事故和共同目标的不断协商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不能只包括美国和日本，而必须包括其他有关的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朝鲜，也许还有印度尼西亚等国。在某种情况下，它也可能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这里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联盟，而是能够保证在有关各方中进行这类协商的某种机构，不一定以有约束力的义务为基础，而是出于共同的利益。

关于经济和地位问题，显然更需要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转变为更广泛的、对世界更有建设性意义的关系。这并不是说通过双边努力去解决经济困难是无效的——恰恰相反。美国和日本为了预防两国在数额很大的贸易中发生麻烦，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困难，并且为了在一段时间以后拟订可以共同接受的正规程序，在经济方面正如政治和军事领域那样有一个常设的共同协商机构——不仅仅是一些特定级别的会议——也是非常需要的。双方现在应当认识到，对问题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的时候，通常也总是当问题严重得使人感到棘手的时候。

此外，日本人必须认识到，外国在他们的国家投资可以是互利的，这并不导致受外国的支配。西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从美国的投资中得到好处，却没有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法国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日本人如不使自己的国家对外国投资开放，就几乎不可能指望逐步增加他们自己在国外的投资。他们继续限制外国投资，说到底，是狭隘倾向的一种表现，这种倾向同日本越来越卷入到国际事务中去的状况是不相称的。

除此以外，必须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置于更广泛的结构之内。共同市场的出现，使这样的事实显得突出了：美国、日本和西欧已日益成为世界可能达到的稳定和合作的三个经济支柱。在这些较大的单位之间，以及在与这三个经济支柱有密切联系的某些其他先进的经济单位之间，逐步发展的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运动，将更易于减少那些普遍存在于有较大局限性的双边关系中的紧张和不平衡。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直极力主张的国际分工，可能因此而比较容易形成，这样就可以更加广泛、更加间接地交换货物、服务和产品，从而减少双方的紧张和不平衡。许多日本人曾表示他们对这样一种更广泛的安排感到兴趣，而这种安排的好处也将充分表现在政治领域中，而对于那个微妙的地位问题，尤其如此。

在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中，日本将仍是一个较弱的因而多少有些不放心的伙伴。这样一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滋长持续的不满情绪，只要美国人偶尔采取冷淡的行动，就能损害日本人的自尊心，引起他们的痛苦的猜疑。一个广泛的合作结构（包括逐渐形成一个发达国家共同体的过程）将使日本在为建立更有秩序、更令人满意的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全球性努力中走在前列。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共同体，将不会仅仅是富人的俱乐部；实际上，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应当是作出某种更合理、更合作的努力，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它不会，也不应该是一个新的反共联盟。实际上，通过减少莫斯科或北京想利用国家之间的竞争的兴趣，通过审慎地邀请共产党国家参加既适合于它们的

发展水平，又适合于它们所处的特定场所的地区合作，那末发达国家共同体就会有助于逐渐结束意识形态上的全球性内战。对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来说，某种更广泛的结构，将有同时促进日本的国际化但又不等于美国化的附带好处。美国化为人所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国际化却是必要的。

不管怎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不过需要采取一些更审慎的步骤，来给这个过程规定方向和目标，并抵消影响着美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为此目的，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国家首脑一年一度的定期会议，以及建立某种附设的谘询和计划的机构都是可取的。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会有助于促进共同的观点和规划。同样，应将三方议会议员之间的磋商加以制度化。除上述以外，三方更多的非正式的接触也是必要的。需要鼓励这三方的社会名流不断进行对话，正象蒙内行动委员会和比尔德伯格会议对形成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合作精神所作出的极大的贡献那样，日本人在人员和财政方面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也将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建设性部分。

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美国、西欧和日本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独特的经历：在那些正在脱离工业时代并开始受到新的电子技术时代的挑战的社会中，它们是走在最前列的。因此，它们在年轻的一代以及社会价值的更大的变化方面，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它们共同具有若干相似的社会难题。由于它们富有，它们也对人类中不那么幸运的部分负有相似的责任。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之处把日本、西欧和美国联系起来：它们都在一种民主制度的结构内进行活动，这种结构尽管是远非完善的，却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公平和最合理的政体。总的说来，以上所述确实为共同的和更有建设性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应该牢牢记住的要点是，日本正以宏大的规模进入世界。这个过程对于日本目前的对外关系和内部稳定来说，既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在某种更加广泛的世界合作的模式中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两种后果都不是必然的——不论后果是那一种，都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

（摘译自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和变动》，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72年，纽约）

七、某种国际结构内的和平[①]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十月战争给予中东和平的促进作用，正在进行急刹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既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又是错过了一次机会，这种错过机会可能重新导致战争。大家都承认：在中东，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普遍的和平意愿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决不会有和平。但是和平需要靠希望来培养。如果期望落空，那么正是这种期望可能会增添这个地区的爆炸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姗姗来迟的重新开始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单独媾和，局势本身就迫使人们接受一次基本的"重新估价"，即使"重新估价"这个词在福特给以色列总理拉宾的三月信件的语调中并不含有威胁之意。

这一重新估价的结果，理应是美国提出一项公开的倡议，既概括说明最后解决办法的实质，又提出为此所需要的国际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是必要的，因为单靠美国既不能强使别人接受，也不能维持一个完全把苏联排斥在外的解决办法；解决办法的实质也必须事先预告，以便打开逐步解决办法所不能克服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僵局。

由于1975年3月的谈判失败，福特公然谴责以色列缺乏灵活性，因而引起了轰动。美国政府曾经希望拉宾及其外交部长

① 本文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弗朗索瓦·杜切内和克希·萨基三人合写。——译者

伊加勒·阿隆，能够强使以色列内阁接受计划中的同埃及妥协的建议，后来以色列内阁却拒绝批准这个建议。三月谈判的失败，发生于有关以色列在西奈撤退的协议的细节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增加了灵活性的信号。当1971年摩西·达扬最初建议这样一项交易时，它在华盛顿、甚至在开罗引起的兴趣，比在耶路撒冷引起的还要大。但是那种灵活性只是相对的。以色列的政局本来就是不易改变的。不断强求说服这个小国，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危机：它造成了一些固执不移的人，造成了对于局势和敌人的一种"情况最坏"的看法，并造成一种永久孤立和持久防御的情绪，这就使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几乎不可能产生。这一危机由于以色列的复杂的比例代表制而加重，因为这种制度把不可避免的联合政府的支配权，交给了一些勉强合格的政治团体。这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改变其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方面如何无能为力，尽管当时领导集团中的一些比较明智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一定要有某种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拉宾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的政府拒绝了在占领区为建立新殖民地而进行宗教派别运动。

但是，逐步解决办法的局限性，终究是脱离了以色列的内部问题，或者就这一点来说，脱离了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这种办法本身就具有难以纠正的含糊性，而且以色列也决不会以放弃土地来换取一些本身就是含糊的保证。这就是逐步解决办法迄今为止所已得到的，或可能得到的（甚至是从安瓦尔·萨达特总统那里得到的）一切。的确，萨达特非常需要和平，以便充分利用苏伊士运河，重建其毁掉了的城市，并倾全力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要控制城镇的政治不稳定了。光这一点就是某种保证了。无论如何，这种保证是存在的。但是，不公开地对以色列而是私下对美国作出一个以五年为限期不挑起战争的诺

言，对以色列并不能起这样的保证作用：当以色列用撤出西奈的代价换来的时间告终时，它将不会发现自己由于失去军事上的优势而在政治上比过去更不安全。

这种含糊性，并不因逐步解决办法可能会分裂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这一事实而得到解决。只要阿拉伯外交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不提出来讨论，萨达特给以色列提供的任何表面上看来真诚的保证，以换取埃及在西奈的狭隘利益的局部解决，只能显得是对阿拉伯事业的背叛。这就迫使他坚持某种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以便可以声称他曾赞助过阿拉伯人的更广泛的利益。因此，尽管假定政治上的信任也可以象领土那样被分割成均匀的小块，但是在对未来意图的憎恨和怀疑成为问题实质的一个地区里，这种逐步解决办法已经证明是不适当的。

不战不和？

在这些情况下，某些以色列人可能有兴趣争辩说：对付谈判破裂的最简单、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这种破裂，并且照老样子过下去。有许多表面上似乎讲得通的理由为这样一种态度进行辩解。有一种理由是说没有明显的选择余地：把谈判转移到日内瓦会议上去，极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萨达特似乎同以色列人一样确信这一点。对于任何真正想要谈判的人（埃及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来说，有苏联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在打激进鼓，谈判桌不会是舒服的。多边的讨论不见得会纠正双边外交的缺点；相反地，倒有加剧这些缺点的危险。这样一种会议，很有可能既使以色列又使保守的阿拉伯联盟感到不安，这个联盟以开罗和利雅得为基础，自十月战争以来，一直保持着它在

阿拉伯世界的声望。这种会议只会最大限度地增加情况的复杂性。

此外，从十月战争和它的冲击发生以后，军事上和能量上的均势都已变得稍微有利于以色列。目前以色列人的那种部分恢复了的自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事实：即他们的军事装备贮存量，足以使他们在大致三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内（这是按照历次中东战争的标准计算的一段有效时间），无须靠美国的重新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大大减少对美国空运的依赖，这种空运在一场中东冲突中，很可能会受到有美国空军基地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北约盟国中那种引人注目的中立主义的阻挠。埃及人已承认：他们缺乏武器；而且尽管他们正在通过沙特阿拉伯得到补给，同时也愈来愈多地得到苏联的补给，但是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使他们更易遭到攻击。对军事计划制定者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埃及在1973年攻击以色列坦克和飞机取得最初成功时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技术上的惊人之举，将不会有了。此外，在经济极度衰退时出现的西方石油贮存政策和石油贮备的逐步增加，已使得1973年曾经非常有效的石油武器不那么奏效了。比上述一切更重要的是，有充分迹象表明，萨达特已被迫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为的是使埃及内部的不安定不致威胁他的统治。

已经开始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以色列最好的朋友是它的强大的兵力；亨利·基辛格实际上已使以色列在1973年失掉了一次比1967年更重大的对埃军事胜利。这些说法支持着一种观点，即以色列如果坚持自己的部署，那末阿拉伯各国重新优先考虑本国问题的迹象，可能使时间对以色列有利。这样一种政策曾经保证以色列的生存达一代人之久。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即使美国政府变得吹毛求疵，美国国会内的

亲以派院外活动集团还是有力量足以保证美国的支持。不战不和，也许不是很舒服，但是它确实说明了自由的代价就是常备不懈这样一个事实。

然而，假定时间对自己有利，往往是太自负了，而且从以色列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特别危险的赌博。由于工业化世界依赖阿拉伯石油而造成的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已使阿拉伯人的势力和声望大为增长。阿拉伯人的优势将来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下降，但在人们所能预见到的未来，西方很可能以种种方式继续受到潜在的压力。情况也许会是这样：只要美国支持以色列，欧洲、日本和黑非洲就可以摆脱对阿拉伯人非常屈从的状态。但是美国也敏锐地意识到它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冲击着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它对以色列的支持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以色列在谋求美国的支持方面的那种成就，可能使以色列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终致失败，甚至恰恰使它更加依赖美国。

美国的武器，美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美国在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美国在外交上的庇护，美国在危机时介入以抵制苏联，所有这些都使以色列的政策日益依赖于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线。以色列人的顽固性，使得那种生死攸关的支持要费极大的力气。在舆论值得重视的时代，不让步的表现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能逐渐耗尽一些政治家的好心好意，这些政治家，例如基辛格的政治生涯由于在中东失败而受到损害。它能加强阿拉伯世界中最可能威胁以色列生存的那些势力。希望的破灭会破坏阿拉伯温和派为谈判所作的努力。它会使人们更加依靠军备和战争，目前阿拉伯人有足够的钱去获得军备，并在他们选定的时候去进行战争。它能使苏联更加深入中东，甚至发动石油禁运。对以色列来说，它将带来：更多的战争而不能取得完全

的胜利，战果逐渐好转的对手，以及彻底失败的幽灵。

由于以色列终于发现时间可能对它不利而感到震惊，才使十月战争有了一个新的特色。现在忘记这一点，将是对以色列的前途进行不可原谅的冒险。以色列的绝技是：尽管绝对依赖美国，但在策略上却享有完全自由，以及用军事上的优势对抗一个可能是更强大的敌人，打算把它拖得筋疲力尽，那种绝技，二十五年来一直只是在付出越来越大代价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日益在政治上采取守势。武力政策也许仍然行得通，但是它也可能使更多的以色列人丧失生命而得不到更大的安全。武力政策不会提供退却的阵地，不会提供其他可取的对策，也不会提供用占领的领土来换取同阿拉伯人的正常关系的前景。尽管从拼命挣扎的角度上讲，这种武力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以色列的前途要建立在更巩固的基础上这个角度来看，它又似乎是自拆台脚和目光短浅的。

解决办法

以色列人退回到武力政策，会造成极度的危险，因为当它力图消除威胁着以色列的那种紧张局势时，却加剧了紧张局势。一项解决办法要见效，必须设法处理整个问题，而不只是处理出毛病的一小部分。自然，这种办法往往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迄今为止，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承认阿拉伯人的中心要求（即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就意味着要在离海十二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无可救药的领土收复主义的国家。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信念，按传统的解释将意味着以色列的死亡；阿拉伯人一定会照此办事的。苏联作为巴勒斯坦国可能的保护国，会怂恿它，而且逐渐越来越多地控制这个地区。不战不和的局面

将会继续下去，但以色列将处于一种比1967年还要极端虚弱和危险的境地，更不用说比1975年了。

这种根本的和可以理解的忧虑，是如此厉害，除非认真对待，否则它会使以色列人的政策完全无效——如果它还没有弄到这个地步的话。当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最高目标是完全不相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不可能都对前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全部领域实行独占性的控制。但是这并不排除一个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最高要求的解决办法，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就曾小心谨慎地把巴勒斯坦人的最高要求称为"愿望"。实质上，以色列人的政策目标应该是用它所占领的地区来换取阿拉伯人承认，在以色列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那个可能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的巴勒斯坦国之间，将旧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加以分割。既然以色列人的真正问题应该是安全而不是领土扩张，那末早先通过取得领土来谋求安全的意向，就应该改变为不让潜在的侵略者使用领土来谋求安全的政策。

当然，也许不可能达成一项有关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在1967年前的，或者与此非常相近的边界线的协议。但是，即使达不成协议，至少谈判可以以真正的政治问题为基础，而不是逃避这些问题。届时，以色列的许多政治情况，就可能以某种方式重新显现出来，这在以前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1967年的胜利使以色列处于一种众所周知的地位，就是似乎要把不属于它的东西抓住不放，仅仅表示想要归还所占领土和愿意赞助一个巴勒斯坦国，就会加深阿拉伯人之间的分裂。

另外，要是协议果真达成，阿拉伯人在维护协议方面的兴趣将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在萨达特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继承人的地位冒着相当大风险的情况下，埃及早已试图同以色列在西

奈单独取得谅解，这基本上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四千万人要在比利时那么大的一块可耕地上设法生存下去，其紧张状态比巴勒斯坦人的苦处更要严重得无法估计。埃及不好这样讲，因为眼前没有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假使通过由阿拉伯人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而建立起一个巴勒斯坦实体，那末对埃及，对一些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以及还可能对于象阿尔及利亚那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激进国家来说，形势就会完全不同了。阿拉伯人的其他兴趣，将会比现在显得更加突出。

此外，建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国的日常生活，总是无法不同以色列发生联系的。跟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令人生畏的以及同它有可怕冲突的邻邦交往，将会使巴勒斯坦人形成赞成合作的有力主张。那种现实主义的观点，甚至在目前冲突的情况下就已经在冒出来了。一项解决办法将会使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得到加强。这样，由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理由，一种政治过程就会运行起来，使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阿拉伯战士借以成长的那些挫折也将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色列的政策，就会第一次不是逆潮流，而可能是顺潮流了。这样一种顺利的政治过程，是以色列的真正安全可以建立的唯一基础。

不仅是安全——因为超越仅仅达到和平这一步来看，人们可以提出一个有力的论据，认为以色列迟早会成为中东的新加坡，成为在世界经济中必然会变得日趋重要的一个地区的技术革新和金融居间业务的一个源泉。以色列人的技术知识和发明创造能力，可能成为阿拉伯人逐渐尊重和重视的一项资本。一旦获得了和平，那末作这样的考虑就不是空想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实行经济合作，甚至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委员会加以制度化，并由共同市场和日本大量参与长期投资和开发计划。的确，欧洲和日本越来越多地卷入一些调解工作将是最可取的。

这些调解工作本身就提高了和平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参加，将会起这样的作用：即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进行合作性安排和承担义务的网。

超级大国的保证

当然，要是指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逐渐适应这样一种和解，未免太天真了。这是需要促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超级大国对于领土协议的保证，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来说，并不象基辛格最近所称的是"蛋糕表面的糖霜"，而是对和平条约的整个前途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超级大国对任何领土解决办法的保证，会给那些可能想要推翻解决办法的人，施加进一步的而且实际上是压倒一切的威慑性的压力，同时使力量对比有利于那些准备合作的人。美国单独作出的保证，对以色列来说可能是足够了，但是超级大国的联合保证，由它们参与在商定的边界线两边的安全区进行巡逻的国际部队作为后盾，就可以减少苏联人利用美国的那种单独保证来增加它在中东的势力的危险。(有一种需要小心地加以避免的危险是：超级大国给它们自己分派各自独立的安全区，各有其自己的领域和被保护者。这就可能导致苏联的控制，那是以色列有理由担心的。)不卷入这样一种部队，苏联可以装做是阿拉伯领土收复主义者采取最后手段的莫明其妙的支持者，而且甚至可以着手对这个地区的某些小国实行直接控制。但是，假使明确了占领区的归还取决于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安全的话，苏联就很难拒绝就这种保证进行合作。届时，莫斯科将跟巴勒斯坦过激分子一样，成为归还占领区的障碍。

有人认为俄国人也许可能利用其有限的参与，作为一个担

保者，来威胁以色列的存在，这种论点几乎是站不住的。核对峙的性质就是这样：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一直总是经过直接的对抗，并且现在也是和对抗分不开的。如果人们回想一下就可知道，没有任何局面比柏林更无法忍受了，可是超级大国小心谨慎的习惯，即使在冷战时期也从来没有被违反过。有联合保证给一种解决办法提供基础，任何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边界线的干扰，都会危及超级大国本身之间的关系。这样，俄国人同美国人一样，会出于需要而承担义务去消除危机。这并不是信任俄国人的问题，而是使他们保证自身利益的问题。

苏联的自身利益，也可以回答下述反对意见，即苏联不见得想参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迄今为止，莫斯科虽然提出一些抗议，却可能已经发现中东冲突是一项至宝，使它有可能渗入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可是，只要不战不和能维持下去，情况本来已经是这样了。由于目前看来对峙的结果更可能是战争，苏联不得不考虑到叙利亚被以色列打败会给苏联利益造成各种危险。况且，苏联人已经日益注意到中东冲突反过来影响甚至危害苏美缓和的事实，而莫斯科在美苏缓和中是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利害关系的。

最后，让苏联人参与一项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苏联虽然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东的能力，但还是拥有一些手段来阻挠任何一项完全把它排斥在外的解决办法的。这就是单纯美国的解决办法行不通的原因。此外，苏联参与联合保证可以为控制向中东输出武器的一些更广泛的国际协议铺平道路，这是保证较长时期稳定的一个必要因素。同样，单纯美国的解决办法，相反地可能引起一场新的地区性武器竞赛。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超级大国联合保证边界线，不会使以色列得到它现在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假使保证部队的力量

小，那末一次坚决的袭击就可以突破超级大国的屏护部队。假使保证部队的力量大，那末美国的存在将是压倒一切的，因而以色列将不会有自由。无论如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美国都极不可能负担得起去增强保证部队的力量。根据逐渐形成一个潜在危机的不同方面来看，对于这一点，有四个答复。第一个答复是：超级大国的参与，会加强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对冲突的温和派的论点，并把焦点从军事对抗转移到政治上去。第二个答复是：假使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在形成的话，超级大国会注意它的形成，而且在它发生以前就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争端。第三个答复是：假使阿拉伯人一定要大举进攻，他们就难于知道他们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将是进攻超级大国，并使后者，那怕只是其中之一站到以色列一边去。第四个答复是：假使进攻者果然突破过去，那末来自超级大国要恢复原先存在的边界线的压力，将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威信将成问题。

第二个反对理由可能是：以色列要依赖别人，那是受不了的，因为美国可能由于另有野心而牺牲以色列，或者苏联可能由于一些与以色列本身毫无关系、而是涉及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原因而制造退出联合保证部队的威胁。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对它的所有盟国来说是否可靠，就要看它对以色列是否可靠，反之亦然，在越南战争之后情况尤其是这样。而且，以色列将不会仅仅由于美国人保证了它的边界而放弃其军事力量。

总之，如果能够主要地沿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1967)决议的路线而取得一项解决办法，但是要把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包括在内，并且在商定的边界上由超级大国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来作保证，那末安全结构和政治进程就会在造成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逐步缓和的过程中相互促进。以色列将会比目前安全得多，目前它随时都面临着战争，摆脱不了那种经常的

恐惧——在一连串代价很高的胜利之后，只要一次失败就可以带来大灾难。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以色列目前所不愿干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担心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就等于默认以色列的潜在的灭亡。但是，如果以色列继续不理睬这个问题，或者坚持只有它自己才可以选定与之谈判的巴勒斯坦人，那末它就将宣判它自己永远生活在战争中，并且恰恰造成原来设想不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就可避免的那种危险。十月战争以来的外交态势之一，就是以色列企图越过巴勒斯坦人而同萨达特和约旦的侯赛因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这些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侯赛因代表巴勒斯坦人讲话的机会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控制在他的统治范围内的机会，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渺茫了。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找到一项政策，这种政策与那种逐步处理的办法大不相同，而是要一下子同时概括地提出一个目标；要给以压力，以便坚持通过谈判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要提供政治变化得以实现的时间。实际上，看来唯一可能符合所有这些要求的政策，就是美国倡议的那个政策，美国将会公开地把那个目标定为它的政策目的。

下 一 阶 段

上面提出的一个不能立即实行的最后解决办法的各项条件，其意义在于：如果没有一种考虑到竞争者最强烈希望的合理目标的远见，那末即使问题的一部分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巴勒斯坦问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诸如以色列边境的确切分界、耶路撒冷、赔偿、贸易自由、安全区的管辖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其本身就是各自成为问题的。不过，除贸易与赔偿外，所有其他一

切问题都是同领土问题联系着的；而且所有各项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认为一项为将来提供各种政治保证以代替他们目前所追求的一些军事保证的解决办法能够设想和维持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正视这个中心问题的意愿，就没有希望（在缺乏对基本问题的商讨而引起猜疑的状态下）找到同时对双方具有均等利益的一些临时性解决办法。

因此，美国应该宣布自己的信念是：可以持久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尊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各自在旧委任统治地的不同部分的安全和自决权的那种解决办法。这样一种解决办法，需要超级大国的保证，这种保证应该由超级大国联合提出，但是，如果不是联合提出，就只能由美国单独作出。可以想象，特别是在葛罗米柯 1975 年 4 月的声明已经发表的条件下，美国和苏联可以共同议定一项声明，在此项声明中，它们可以宣布它们愿意为 1967 年的边界线提供联合保证，而把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如何在一个以别的方式联合的耶路撒冷存在下去的方案的拟订问题，留下来另行谈判。这样一个共同宣言，会使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受到很大压力，特别是如果到那时欧洲和日本赞同此项宣言的话。这对以色列的政策也许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以色列无疑地会竭尽全力通过美国国会来改变那个政策的，但是美国公开支持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的态度，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可能会获得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支持。

这样一种政策显然是有各种困难的。它肯定会被认为是做得过火，而且是在以色列的生命而不是美国人的生命危如累卵的时候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它也可能被认为不会有很大效果：它不会自行对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以改变其方针，反而可能经常遭到来自国会的批评。但是，假使美国要作出这样一个宣言的话，它就会在谈判有缺乏劲头的危险时，继续保持那种势

头；它就会在任何其他外来的（或者可能是内部的）影响都不能冲击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时候，以某种既能冲击以色列人又能冲击阿拉伯人的方式来使人注意有必要改变方针。而且，由于是在其他大多数迹象都只表明前途捉摸不定的时候指出了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它就可以开始给人们一种建设性的印象，即以一项能够实现的解决办法去取代无休止的破坏。

同样真实的是：如果萨达特愿意作出暂时不挑起战争的公开保证（这可能会使他看来似乎要抛弃他的盟国），或者如果拉宾政府准备接受埃及私下对美国作出的保证（这恰恰是该政府所拒绝接受过的），那末一个关于西奈的临时协定也许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十月战争以来的事态也已表明了如下两点：第一，不设法抓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中东冲突的中心问题，那就不再有达成协议的余地（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几乎肯定是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言）。第二，基于在人情上非常容易理解但在政治上却有造成惨重损失的危险的种种理由，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象能自动地并且同时地向和平突破。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作为唯一有能力使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在旧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内的和平共处能够长期巩固的大国，现在就必须为一种国际解决办法采取主动。

（摘译自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75年夏季号）

八、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美国

在第一个明确信奉独立原则的国家诞生二百年之后，出现了一个以自决为基础的世界，但对于曾经为形成这个新世界作出了如此直接贡献的那个国家来说，这个新世界已变得莫明其妙地令人烦恼和有威胁性。事实上，它给敌对的世界带来了一个孤立的美国的幽灵。

那个世界之所以看起来是敌对的，不是因为它自己宣布是敌对的——虽然有些部分是这样宣布的——而是因为那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与美国的社会准则和期望不相容。由于政治上更加活跃的群众所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物质的平均，而不是集中在精神上和法律上的自由，因而世界政治正在变成平均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而且，世界权力的分配开始有利于那些在哲学上、文化上、种族上和人种上与美国的经历显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同时那种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正预示着有采取新的暴力形式的危险。这一切在美国助长了一种对于世界变动的猛烈冲击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助长了关于美国反对世界变动的感觉。

结果，在美国人如何从他们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来看自己以及世界大部分地方如何看美国的方面，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传统上，美国人一直把他们的社会看作是未来的信号，并且看作是普遍适用的自由主义社会准则的体现；而世界的大部分——不论是贫穷的移民或是积极的民族主义领袖——以前

对美国的看法差不多也是这样。这种在自由主义方面的联系规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并给予美国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现今，当国外有很多人——特别是在新兴国家中——认为美国对他们的处境漠不关心或者甚至是敌对的时候，许多美国人以恐惧的心情从他们认为是走往错误方向的世界后退了。美国所获得的恩赐——这在过去差不多被看作是历史给予美国争取自由的报酬——已经成为被人妒忌的焦点，从而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新解放国家所宣称的平均主义社会准则的种种忧虑。

哲学上孤立的危险

美国是在争取自由中诞生的。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在美国历史的随后二百年中决定了美国的许多特性和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它还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候，决定了世界对美国的反应的性质，从而使精神上的含义成为美国的世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诚然，美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甚至政治现实同自由主义这个理想相差很远。在争取自由中诞生的美国，主要是拥有奴隶的农村寡头政治和新出现的城市商业阶级的一种混合物，其选举权只为少数人所有。可以把这个国家诞生后二百年的历史，大部分看作为实现那种自由主义理想并在不断变动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下充实其内容的一种斗争。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选举权的扩大，向无数的移民开门，社会权利的落实，环绕工会的出现而发生的暴力行动，为黑人的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晚近妇女对本身权利的坚决要求，与更大的而且更有影响的个人财产的出现，社团对公众影响范围的扩大，大批具有制度化权力的官僚的出现，以及以主要设在纽约市的仅仅几个全国性出版物

和三个电视网为基础的商业化的大规模宣传工具在文化上的广泛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同时期内发生的。

> "……许多美国人……把这个敌对的世界看作是冷战的结果，用这种使人安心的简单概念来回避问题……"

这种方式使美国的历史具有自相矛盾的含义——它证明对美国的过去作最粉饰性的解释和最批判性的解释都是正当的。然而这种矛盾心理——这是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所固有的——并不否定美国使命的特殊的历史象征意义和历史的本质。历史上有一些时刻，它们引起并代表一种情绪，它们表达——不管怎样不完善——某一种普遍的渴望，它们给予——不管怎样不适当——感觉得到的希望以一种实质内容。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自由的概念（同进步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还很渺茫"——等到美国的出现才把它表达出来。虽然进行类比可能使某些人感到讨厌，但是上述事实也说明了为什么古巴或中国今天对那么多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人口日益拥挤的世界中，平均的概念越来越成为基本的情绪和感觉得到的愿望，它通常是由知识分子首先表达出来的。因而——尽管统治古巴和中国社会的是严密的组织和普遍的控制——对很多人来说，这两个国家已成为重要的象征，这同十八世纪末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对许多有同情心的和着了迷的欧洲人所发生的影响，并无不同。

的确，在重读美国革命后初期那个时代的某些报道时，人们甚至对于它们的语调和内容，同不到二百年后访问中国或古巴所写的报道的类似程度，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类似之处突出了政治事变对于普遍存在的情绪或者正在形成的社会准则的重要关系；政治事变既使情绪具体化又起着一种使其具体化的催化剂作用，使它变成一种令人信服的看法。因此，一种原有

的理智的接受能力就由于据说已经符合愿望的现实的报道而被转化成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报道由于它具有外国来的特点而更为有力——正如当时对美国的访问或者近来对中国的访问的报道那样。这使讲故事的人也带有曾经参与某种独特的、也许有历史意义的神圣事件的味道。

因此反复提到了由个人道德和公民献身的崇高观念指引的诚实而勤勉的人民。正如1788年布里索·德·沃维利在其《美利坚合众国新游记》中所表述的那样，美国人都是具有"简朴、厚道而威严的外表的人，他们都意识到他们有自由，对他们来说所有其他的人完全是兄弟和地位相同的人"。波士顿人特别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有礼貌，而且乐于帮助他们的朋友；他们是温和的丈夫，是可爱的——几乎是可崇拜的——父亲，而且是仁慈的主人。……一个姑娘相信爱情所表示的誓言，而她的小伙子则坚守他的诺言，不然的话将永远蒙受耻辱。你看到姑娘们在乡村里同她们的爱人乘二轮双人马车出游，而且他们天真的快乐决不会由于无礼的猜疑而被打扰。"

有一些关于个人访问最高领导人的激动人心的报道，这位领导人是一个具有天赋的特殊魅力和独特远见的人。米利安·尼迈斯威茨（一位波兰贵族，他第二次旅游美国时曾经同撒迪厄斯·科修斯科在一起）在美国东部沿海旅行时写的见闻极广的日记中，在他的《1797—1807年美国旅游记》一书中，对于他在乔治·华盛顿家里逗留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它使人读起来——没有对元首不敬的意图——如同比较晚近的同时代人的访问记。尼迈斯威茨于1798年5月初在乔治城一次社交集会上首次被介绍给这位将军，又于那年6月作为第一任前总统的客人在芒特弗农消磨了十二天时间，并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位名人、他的妻子、他的生活作风，以及他的见解的生动报道。他特

别被这位美国领袖的政治远见和公民献身精神所深深感动。尼迈斯威茨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感情，即他发觉自己处于历史的伟大事物面前，处于“一位伟人”面前，“他的美德同他为国家服务的功绩是相称的”。

最重要的是，一些早期编年史的作者表达了这样的感觉，即新的美国的现实是某种非常特殊的事情的开始，就是美国既代表着又正在创造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埃德蒙·伯克，尽管对民主政治持怀疑态度，也许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感情："一场伟大的革命发生了——不是由于现存的任何国家的权力分裂和变革所造成的革命，而是由于地球上一个新地区里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新国家所引起的革命。它在权力的一切关系和均势方面所引起的变动，就象一颗新行星的出现可能在太阳系中引起的变动一样大。"

指出上述一切的目的不是要描述美国和中国的类似之处，也不是怀疑一些观察报告的正确性。更确切地说，目的是要强调这样的主张，即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中，有一些时刻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所以美国人对他们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应该是既自豪又谨慎，以免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正如R·R·帕尔默在他的《民主革命的时代》一书中评述的："美国革命与启蒙时代的高潮在时间上恰好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就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美国的自由精神和美国制定宪法的独特而新颖的实验，影响了欧洲，并且作为一种结果——再用帕尔默的话来说——"美国革命作为一次革命来说，其影响是无法正确估计的，也是非常大的。它激起了一种关于一个新时代的意识。它给进步这个概念增添了一种新内容。它赋予了由于启蒙运动而使人们熟悉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以全部新的含义……"

因此美国的出现是历史的分水岭。关于美国独立的言论和

人权法案的原则最明确地表达了一些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当时在欧洲正开始露头，但由于受到欧洲一些制度的传统力量的压制而不能实际运用。正是在更易变动和灵活得多的美国社会环境中，这些观念能够在政治上逐渐占优势，它们作为这个新国家的正式信念出现，对一些进步的欧洲人发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感染作用，这些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感到受不了，希望有彻底的变革。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单是几个部分地是传统农业的和部分地是商业的遥远的殖民地从母国分离出来的事实，是不会获得全世界很大共鸣的。

美国诞生时的自由主义面貌以一种特别令人信服的方式给美国的经验打上了标记——这种面貌对于美国人最后如何自我阐明，以及别人如何看美国，都有持久的影响。它为一个持久的和强有力的神话提供了基础，这种神话甚至持续到美国终于象其他各国那样行动的时候，甚至持续到美国的商业在力量较弱的毗邻地区（特别是在中美洲）成为强大的扩张和剥削势力的时候，甚至持续到美国成为那些只能说稍微受到自由主义情绪促动的国家的主要保护者的时候。正是自由主义的神话，使美国军队在欧洲甚至在亚洲的某些地区受到欣喜若狂的人群欢迎的情况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而且也正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神话（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好机会），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到美国来——而不是到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去。

自由主义神话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自行长存的传统，它受到美国公共教育的培育，由于美国一些总统的讲话而增加了分量，并且为某些美国人所乐于接受和热心传播——特别是有关他们原来的国家的内容。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政治上受到那些强调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思想支配的程度来看，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准则的这一体现，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

哲学上的支援，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一般地说在当时是与自由的概念居首要地位相一致的。就美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本身来说，美国是最自由的社会——即使它的许多社会安排造成了不平等和有区别的自由——而边界的开放——在东部对移民开放，在西部对拓荒者开放——有助于达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国内的个人自由，自由市场，社会和地理上的变动，所有这一切合起来，就在自由的民主政治这一概念中把神话和现实纠缠在一起了。

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但它确实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使人们能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美国对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曾经是一种解放的关系。的确，甚至三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并未损害反而加强了那种关系。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新政把自由主义和一点社会主义的混合剂创造性地应用于美国的条件（因为两种理论都体现着对早先欧洲工业经验的重要反应，也是这种经验的典型的综合），制定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对许多欧洲人说来，又变成令人信服的关于未来的看法。它似乎是通过把平均主义的社会成分注入于个人自由中的办法，来维护甚至增进个人的自由。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的吸引力达到了顶点。

> “……必须牢记，毕竟只有美国才有力量为它自己塑造一个敌对的世界。”

结果，美国的对外政策由于有哲学基础和对公众的吸引力而起了作用，这种基础和吸引力给它提供了举世无双的资本，而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处的最高地位来说，其重要性，就象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相应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于世界其余部分的军事力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性一样。虽然平均主义已经

在一些更先进的社会中开始取得了势头，它的吸引力却受到了限制，一方面是由于丧失信誉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其余部分的很多地方仍然全神贯注于它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这一事实。象尼赫鲁或恩克鲁玛或苏加诺所经常强调的那种解放，主要是从美国革命而不是从布尔什维克革命或从中国革命获得激动人心的力量。

然而在那个过程中，正在发生一种微妙而加速进行着的变化。西方的、大部分是城市的社会，正在悄悄地变为着重于搞福利，而一些新兴国家，差不多在它们诞生的时候，很快就遇到了自觉地看出来的全球性不平等的现实问题。它们所获得的外部自由（这是国内自由极少比得上的，如果有时比得上的话）也就成为要求更多的全球性平等的出发点——这种全球性的平等更经常地是从外部情况来下定义的（例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于1973年在《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宪章》中提出的）而不是在国内实行的，其结果是，在二十五年时间内，一些比较活跃和比较善于辞令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所全神贯注的主要问题，一直在迅速发生变化。

这种新的局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后普遍存在的局面成为尖锐的对照。大西洋宪章的确表达了一个时期的占优势的一些渴望——而美国则代表着这些渴望。当时美国的社会准则和利益同世界上比较活跃的和主要的地区的社会准则和利益是一致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通过保护欧洲人的自由而增进自己的自由；通过资助欧洲和日本的恢复来增进自己的经济福利。现在，美国关于个人主义、自由企业、职业道德和效率的传统社会准则，在国内而且甚至更广泛地在国外都受到国家统治主义的批驳，这种主义强调国家的或社会的集体，强调社会的平等，而且强调福利。对于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渴望，是

新的全球性的精神状态的象征——美国同那种渴望的关系是非常自相矛盾的。追求更大的全球性的福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象是对他们的资源提出一种要求，而且象是预兆着要没收他们的劳动成果，结果是对一些新兴国家的同情已逐渐被日益增长的疑心和反感所代替。在美国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之间，在社会准则和感性认识方面开始有了分歧。

美国在哲学上史无前例的孤立所带来的危险，已经由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1969年当权的尼克松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新风格和新内容而加重了。这种政策的风格是隐蔽、玩弄权术和诡诈，看来它信奉一种以传统的均势为基础的、基本上是静止的世界观，因而企图在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谋求主要大国之间的和解，而且更通常地倾向于保持现状而不是改革它。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越南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分歧（说来自相矛盾，这场战争是由对世界的变革比较同情的政府发动的），而且给国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日益敌对的态度提供了感情上的基础。

一国的资本主义

哲学上和政治上正在出现的孤立，迟早也可能变成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孤立。虽然世界肯定不是朝着一个单一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方向变动（而共产党所期望的世界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倾向于过分简单化的乌托邦的一种教条的残余），变革的主要模式，是走向更为都市化的，更为工业化的，更为福利主义的，更为人口密集的，而且也许更为国家统治主义的社会。国家统治主义，这里是就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将是经济变革的主要发动者和国家资源的控制者这个意义而言。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情况将继续会有很大差

异，不会出现一个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模式。

尽管有这种差异，一般的趋势还是走向这样一些制度，它们同美国的私人企业、公司所有权和政府的间接控制这种混合体确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美国并不是不受这些趋势的影响，但由于大萧条后的新政表明，在美国社会上对于政府的作用有一种新的看法，因此它比其他大多数先进的工业社会一直更不愿接受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的干预。甚至它的最接近的邻邦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社会立法方面和在扩大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力的范围方面也曾经走得更加远得多。此外，从理论宣传的辞藻方面来看，美国对自由企业、对营业道德和对营利动机的创造性作用的信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业文化——也显得与众完全不同，甚至是西德或日本这样一些同样是商业倾向的社会所不能比的。这种辞藻在某些方面正好与现实相反，因为下列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美国也有重大的变化，如美国客运铁路公司，这以后就是：联合铁路公司，全国房屋建筑股份公司，通讯卫星公司，对洛克希德的财政补助，至于更早的田纳西工程管理局，或者国防部同一些与防务有关的工业之间复杂的但肯定是密切的关系，那就更不必说了。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在其他一些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一直比美国有更迅速的发展。尽管法国指示性的计划不能同共产主义类型的国有经济的集中计划相比，尽管日本通商产业省（甚至考虑到它同经团联的共生关系，以及后者同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物的联系）的指导作用也不能同苏联经济计划委员会相比，在这两个国家中，政府的经济作用更为明确和直接得多。正如雷蒙德·弗农的《大实业和国家》一书中的资料所表明，在其他一些先进的民主国家中，公有制已经有相当大的扩展，并且包括了工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政府相对卷入的程度甚至更高，特别是因为它们的非农业私营部门一般仍是软弱无力的。

一国的资本主义，可能是美国模式中所固有的。就象斯大林的“一国的社会主义”那样，它可能在美国引起一种被围攻的情绪，而且也象苏联的情况那样，这种情绪大部分是自己引起的。因为经济上的差异或特色不一定会助长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意，特别是如果这个与众不同的模型（即使不再作为模型而发挥吸引作用）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话（就象美国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这方面，对美国人来说，把意识形态上关于当代世界的斗争是自由民主和各种形式专横的国家统治主义之间的斗争的说法，引用到美国对外关系方面，那等于是对早已指出的美国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孤立于世界的倾向，从经济上给予有害的支持。把自由民主说成是主要问题——就如1975年政府的一些主要发言人所做的那样——也使美国失去了利用它的多元论信念的机会，这种多元论是积极强调美国支持世界的多样性的。相反，由于把现实的世界分为两部分，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一个反对美国的教义联盟。

这种联盟也能够从国外广泛流传的下述看法获得支持，即认为美国商业的对外扩张，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的幌子下，意味着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新形式的帝国主义。这些在国际上积极活动的美国公司（经常是在地区的或全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后来被不准确地贴上跨国公司的标签）的出现和大事扩张，本身就是美国资本在国内投资机会减少的一种反应，这种减少主要是由于社会所加的限制和所承担的社会义务都扩大了。但是，这些公司的出现和大事扩张，也发生在全世界政府的数目突然增多，并且更加全神贯注于由国家控制主要的或必要的经济部门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把对美国在国外的经

济势力的不满同美国经济制度的性质联系起来。结果是，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虽然并不仅仅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一种显著的反对美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偏见。

这种偏见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看法的分歧。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商界人士来说，"跨国公司"是对正在形成的互相依赖的新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反应。在约翰·迪博尔德的《跨国公司：为什么害怕它们呢？》（见《外交政策》第十二期）一文中，跨国公司被说成是一种传播工艺、技术知识、资本以及生产的一种灵活的和超越国界的工具；正在为一个更加真诚合作的世界铺平道路；他又说："逻辑上必然的和最后的发展……会象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将是国籍和国家政府的消失"。然而恰恰相反，在国外更经常地听到的论点（虽然一些比较激进的美国经济学家也这样讲），认为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资本主义势力间接扩张的一种工具，它有意地或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依赖和剥削的新形式，因为从此以后"某些国家的经济将由它所从属的另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扩张来决定了"。① 大体上说，这种观点很容易支配新兴国家的看法。因此，在跨国公司问题上的争论，就是把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正当的相对的估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更多地属于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扩大到世界经济方面。而且更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在制度上以及在概念上孤立的危险。

对美国经济活力极其重要的若干领域内，正在出现资源缺

① 本杰明·J·科恩，《帝国主义的问题：支配和依赖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3年），第190页，同样被引用于C·弗雷德·伯格斯坦和劳伦斯·B·克劳斯合编的《世界政治及国际经济》（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1975年），第44页。

乏的弱点，这使哲学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差异之间的联系更加具有威胁性。美国对进口矿物的依赖正在逐渐增加，因而美国同一些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美国的国家保持正常的政治关系，也就越来越利害攸关了。虽然任何认真的估价必须把代用品或者发展其他可以代替的生产方法的可能性考虑在内，根据内政部长办公室发表的1970年采矿和矿物政策条例系统地研究出来的资料，在象铝、石棉、钡、铋、镉、铜、金刚石、氟、锗、金、铟、铅、水银、沙和砾石、硫磺、锡、钨、铀和锌这些项目中间，即令不受政治因素的支配，仍表明商品有日益缺乏的前景。在美国经济中，从矿物的自给自足到部分地依赖外国的逐渐变化早已在发生了。美国在1950年依靠从国外输入的商品，按美元计算，只占它所需要的百分之十五；到1970年时，输入的商品已增加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到2000年时，所占的百分比可能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

到目前为止，这种发展情况还没有产生某些观察家所预言的一些更可怕的后果，这是他们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73年成功地自行决定价格之后所预言的——特别是关于资源缺乏和资源卡特尔化的两种预言——但是美国的进口费用有明显地大大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就其本身而言，将在美国执行对外政策方面引起一些新的紧张状态，同时某些外国可能开始力求更有意地利用这一事实，即只占世界百分之六的人口消费了世界石油总产量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天然气的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煤的百分之十五，钢的百分之二十，铝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及铜的百分之三十。

制度的独特性和独一无二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使美国成为感情上敌对和经济上施加压力的明显目标。那种压力很可能不是来自建立在单一商品基础上的卡特尔（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的特殊情况是很难重现的）而是可能来自政治与经济混合的联盟，在这种联盟中一批不同的国家可能试图将它们各式各样的资本结合起来，以便迫使美国朝一个特定的方向走去。企图这样做的倾向很可能由于世界经济的普遍政治化而加强。具有薄弱的私营部门的新兴国家的激增已经把许多政府硬推到一些对外经济任务方面，这在别的一些国家是由私人企业承担的。对于资源由国家控制的日益强调，已经造成了把外国人的资产普遍国有化，特别是在一些可以开发自然资源的地区①。由于对世界资源的管理（无论是商品价格还是开发深海资源）需要提供某种结构和稳定性，因而又引起了进行新的国际谈判的需要。新兴国家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感觉，即现有的一些国际安排使它们的经济永远受到损失，这种感觉已经促使联合国对于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进行毫不含糊的调查。所有这一切已经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扩大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以前由私营部门或通过私人和政府的谈判主要在商业准则基础上处理的一些问题，现在有被注入政治内容的趋向。其结果是加强了政治动机和政治准则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起了支配的作用。

在那种背景下，美国处理事情的方式在结构上的改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可以进行抵制，美国的制度还是不得不逐渐使自己适应这种正在出现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政府只得对于甚至原来由私人企业筹划的各种安排也进行磋商，提出保证，

---

① 按照一种计算，在1973到1974年中，单是在非洲十八个国家就颁布了大约三十七项比较重要的国有化法令，涉及受到影响的外国资产的大约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百。参阅C·L·亚历克山德罗夫斯卡娅和I·马特森科合写的"非洲国家国有化的经验和问题"，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5年第7期，第51—52页。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保护。石油危机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促使国会对政府施加压力，坚决主张政府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活动和业务实行更大的控制(包括与石油生产国谈判在内)。这也有利于加强国家的作用。所以由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的经济作用继续扩大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可能变得有点模糊。不过，十分明显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哲学上和结构上的根本差异都将继续使变动中的世界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意志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可能很容易地滑进一种被围攻的心理状态。警报的信号是很多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1975年开始反击来自新兴国家的批评，受到了全国很大的称赞，他所用的词句几乎象五十年代初期另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用的同样尖锐，当时那位大使是为了有力地反驳苏联的攻击才被任命的。在1975年10月3日举出大量例证的发言中，这位美国大使用充满激动人心的形象化词句，表述了受到敌人各方面攻击的被围困的民主的少数派的想法：

> 今天联合国内留下来的民主国家不超过两打。其余全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以及各式各样的古老的和现代的专制国家。使这些国家这样团结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的失败的信念。……全世界感到民主制度处于困境中。水中有血，鲨鱼就疯狂起来了……

这些话在美国社会的各式各样集团中引起了人们内心的反应。对于有组织的工人来说，把这些话同最近几年中由于美国

官方既迎合共产主义国家又迎合新兴国家而被看作一种危险倾向的情况加以对照来看，是欢迎的；对于长期支持开明的国际主义的有影响的犹太居民来说，这些话，是对苏联、阿拉伯、非洲和亚洲反以色列联盟的理所当然的反驳；对于美国社会比较保守的部分来说，这些话表明为时已晚地承认美国的社会准则受到了威胁，那是由于向那些社会准则和管理方法根本敌对的制度进行有害的求爱而受到的威胁。要让别人告知说：在复杂的、变动的世界里"大多数新兴国家和大多数古老国家已经终于成为象我们所了解的自由的敌人"（就象上述同一次演说中所讲的那样），不过是为逃避复杂的情况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罢了，那怕这种借口是在孤立主义的自以为是的幌子下。

然而这种孤立主义的自以为是，可能表明对于构成美国整个制度的正统性基础的两个孪生的成分是特别有害的。这种正统性，从更深刻的心理方面来看，一向是从乐观主义和普济主义的结合中产生的。大多数美国人本能地相信进步的概念，并且认为他们的制度是这种人类进步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表现。大多数美国人还曾认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对于世界其余部分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典范。可是在新出现的情绪中包含着突然承认"进步"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并承认美国的制度不再是普遍适用的福音的传播者。这可能助长美国人更加有相对论者的自我感觉，从而在某些方面更为成熟和更为现实。但是这种制度的正统性的根本来源突然枯竭，可能证明制度是不稳定的，而且可能促使许多美国人用"敌对的世界"是"冷战"的后果这种使人安心的简单概念来回避问题——用这两种概念来代替对世界的复杂性从政治上加以区别。

要从一个突然显得十分可厌的世界脱身的诱惑，还来自美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具有这样的后果：即破坏了美

国社会早先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也破坏了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一种积极作用的意志。那种一致性，一向是由下述事实而得到加强：由于有一批在对外事务方面相对地说具有相似观点的杰出人物的存在，他们多年来使美国社会有明显的信心和方向感；由于美国公众把世界事务的一般概念内在化，即使是一些新产生的现象，经过若干年后也可以被吸收到这种一般概念中去；还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对一些基本的社会准则和优先考虑的事项有共同看法。总之，早先这种一致性的基础，是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种杰出人物，是把冷战作为基本的组织原则，以及公众把对外义务比内部需要放在更优先地位的意愿。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内部和美国外部意义深远的变革互相混杂、互相影响，上述一切已成为过去了。一些新兴的和更激进的国家的出现，国家统治主义的蔓延，和对于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都不符合早先的冷战公式，不符合保证一代人和平的世界均势的传统观点（象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位先生所宣传的），也不符合那些带有更多国际主义色彩的强权政治的批评家和主张通过援助及开发以实现和平的鼓吹者的良好愿望。

很难估计要经过多长时间，美国才能接受一种关于正在出现的新世界的合情合理的前后一致而又灵活的概念的认识。姑且不说在制定既能对全球复杂情况作出反应同时又能被更广泛地接受的建议的过程中思想上的复杂性，由于当代美国杰出人物的特点和美国社会准则的变化，事情已被弄得复杂了。在美国社会享有特权的白种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名牌大学出身的、华尔街的对外事务方面杰出人物的衰落，是这种变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杰出人物在对外事务方面占支配地位已超过半个世纪，他们在美国很快上升成为世界伟大国家的过

程中，为国家提供了很多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力量反过来又是以一致同意的社会准则和牢固的社会制度的坚强支持为基础的。

这些社会准则，尽管它们的确切定义难以捉摸，却不过是新教徒的传统道德准则，美国人的强烈爱国主义，"命定说"同威尔逊"普济主义"的混合，以及凯恩斯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结合体，所有这些因素都由于三十年代没有能形成一种集体安全的制度而大大受到了限制，这种制度所以不能形成，部分原因是美国放弃了责任。这个结合体中所固有的美国应当担负特殊世界责任的强烈意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又得到了加强。所有这一切在公众方面至少助长了要使美国成为世界伟大国家的隐晦的愿望，并且把杰出人物要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的雄心同公众希望美国受人爱戴的愿望以及美国人对美国的理想主义的普遍信念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杰出人物获得了有国际倾向的东部商业银行界的一贯支持，由于这种支持，这些杰出人物同后者确实有共生共存的关系，而且他们也经常通过私人的密切接触，同新教的传统和教会有联系（在这方面，杜勒斯和艾奇逊二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但决不是仅有的例子）。

越南战争是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种杰出人物的滑铁卢战役。但是正如滑铁卢战役那样，在最后战役之前先有一个衰落时期，因而设想单是这场战争就摧毁了这些社会杰出人物的士气、动力以及对外事务的垄断，将是错误的。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不断把一些新的团体带到美国社会的前列，他们吵吵闹闹地要求承认和要求适当的地位。在他们当中突出的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他们在社会方面和哲学方面的兴起是与美国文化的更大危机同时发生的，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在《两个

时代之间》一书中更充分地论证的——是由于美国社会史无前例地超越工业时代而跃进到一个工业时代以后的新的电子技术时代，对于这一跃进，哲学上和文化上都没有事先的准备。结果造成了美国社会准则和文化方面的一场大动荡，一场缺乏信心的危机以及种族关系的急剧破裂。关于后者，公众的注意被吸引到人种引起的问题方面，但是为了撤换和取代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这些杰出人物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不重要的，虽然不那么明显。尤其是在文化—新闻战线上，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在这条战线上痛斥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很快地就风行一时，所用的词句，如果被用到任何其他集团身上，本来会被认为是人种上或种族上的偏见。人们广泛阅读的戴维·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书的基调，是把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说成骄傲自大的和历史上无关重要的人物（把邦迪兄弟俩描述成为缺乏英雄品格的角色），而且在某些方面，这本书——就象许多报纸上的文章那样——还是这种文化—种族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职位，与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统治的垮台——以及早先的概念体系的崩溃，恰好同时发生。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些新的和在对外政策方面同样是观点一致的杰出人物的出现。也许最有成就的种族集团——替代着被撤换的那些享有特权的白人——现在是犹太人（在重要的政府职位上表现得很能干），但是统治的方式有较大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这种比较灵活的情况下，学术界和新闻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商业和教会职能的继承者出现——成为对当局进行批评的主要来源，他们承认或否认它的合法性并对它的政策施加影响。这两个集团都不受那些享有特权的白人控制，也都同样不赞同那些享有特权的白人的传统的

社会准则，两者都不大赞成某种一成不变的世界观，而且后者特别倾向于——部分是由于职业的驱使——对世界政治抱一种更加易变的和印象主义的态度。此外，两者既没有前后一贯的社会准则又没有取得社会的信任以形成持久的领导。学术界由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而幻想破灭了，而且日益受到这种主义的强烈感染；当反对总统滥用权力的斗争更普遍地鼓励了在同政府的关系中采取敌对方式的时候，全国新闻界从职业上说都是怀疑的。

七十年代初期由此而造成的政策真空，主要是由基辛格填补的。他的“特别电视节目”使辩论偏离了一些更加基本的问题，并给予政府——至少是在短时期内——在对外事务方面玩弄权术的一定机会。不管怎样，这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和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早先存在的一致的瓦解，以及基辛格的管家身分所具有的不坦率作风和玩弄权术的特性，起了促使国会加紧参与直接制订对外政策的作用。在战后大部分时间内，由倾向于主张对外事务方面两党一致的领导人所领导的国会，认为它是了解并参与过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战略目标的。在那种对于战略的一致理解的基础上，国会曾准备好允许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在策略上有相当的灵活性。但是在国会日益怀疑政府宣布的原则实质上都是骗人，以及早先的一致已被越南战争破坏的背景下，当辩论更重大的战略问题的时候，国会却更加倾向于把策略问题硬插进去讨论。

结果不仅是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不管是塞浦路斯还是巴拿马）上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发生冲突，而且——在美国社会已有广泛变化的情况下——在政策辩论时有越来越多的零碎小事情来干扰。由于缺乏早先的一致，由于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

的白种杰出人物不再代表某种所谓的整个国家利益并不再使之合法化，因此希腊族人能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更有效地对议员进行游说，而且较少有被谴责为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的危险；犹太人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冲突问题上，以及更通常地在美国对中东或联合国的政策问题上，也可以这样干；南方人可以阻挠美国改变对巴拿马的政策以及由此派生的对拉丁美洲的政策。

在全国的促动因素产生这种分歧的同时，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民意测验不是持久趋势的可靠指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提出特定问题的方式又取决于测验时的情绪，而且尽管可以得到的关于美国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态度的大量资料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提供始终一致的图景，但是从若干互不相关的民意研究报告中已经得到了一些标本，足以据此得出某些重要的结论。撇开细节不说，投票的数据资料暗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公众：(1)已经贬低了美国外交和国防方面的优先性，提高了国内事务的优先性，并达到了后者占相当优势的地步；(2)已经变得不愿意以一致的方式支持较大的国防预算拨款；(3)已经变得不那么倾向于把苏联和(或)中国看作对美国利益的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4)已经变得普遍地更倾向于赞成减少或撤退美国驻在国外的军队；(5)已经变得日益怀疑对外援助的效果或必要性；(6)已经变得对联合国和对日益在联合国中占优势的第三与第四世界的联盟更加大为不满，以及(7)甚至已经开始不那么赞成美国进行对外贸易。更普遍的甚至更出人意外的是，美国公众已经变得日益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孤立主义者(在1974年回答罗珀民意测验提出的关于自我鉴定的问题时，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回答者把自己说成是国际主义者，有百分之三十七说成是孤立主义者)，尽管多少年来“孤立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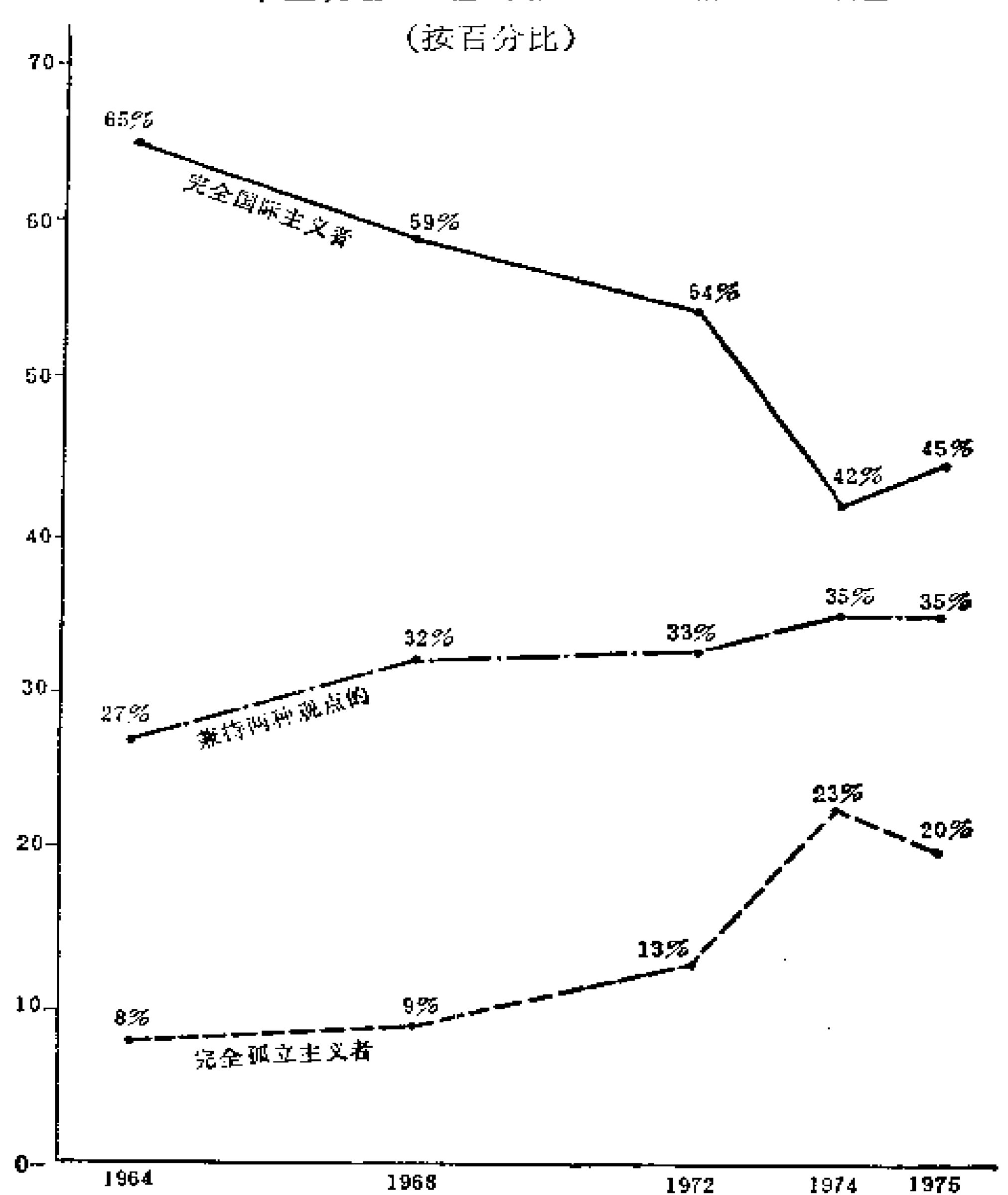
者"这个名辞一直有着消极的含义①。

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就断定新的孤立主义的一致已最后形成，这将是错误的。资料并没有证实那种认为美国正在明确地内向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对外干涉问题，公众的态度往往是不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反对的；但在少数情况下，多年来一直是坚定支持的（愿意对遭受攻击的友好国家提供援助的人数较多，并且相对地说是一个常数）。更重要的是，公众仍然愿意支持国际上为人权所作的努力，并支持（拥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多数，与此对比，1947 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民意测验表明，对于处理各种新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粮食、能源以及通货膨胀）方面进行国际性合作的必要性，和对于先进国家之间更密切地合作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高了，而且对于美国在国外的发展同国内的未来前景密切相关的认识也提高了。简言之，尽管舆论有尖锐的分歧，孤立主义的情绪却并不占优势。

---

① 总的来看，公众的这种思想感情往往同杰出人物的态度是一致的，而在某些方面，这种思想感情甚至更加占优势。正如B·M·拉西特指出的："反对军事开支的态度明确地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人当中，他们最可能对国际事务感兴趣，最可能去投票，去发起捐献运动，以及在其他方面成为政治上活跃的人。"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份关于公众和杰出人物态度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领导集团中，同样地有较大的一边倒的倾向。这种趋势特别明显地表现在 1974 年选举后来到华盛顿的一些新的国会议员中（并且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党员中间，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在回答关于要求指出对世界权力具有最大威胁的国家这个问题时，指名苏联，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认定以色列有类似的情况）。总的说来，据报道，例如众议院于 1975 年中期以百分之五十三对四十一票的差数否决了对外援助。

1964--1975 年国际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对比的趋势*



* 关于 1964 年和 1968 年的数字，都来自对关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采取的一般态度的五项说明的回答。关于 1972 年、1974 年和 1975 年的数字，则反映了对同一组的五项说明和关于美国为了保卫盟国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两项新的说明的回答。

来源：波托马克合伙公司，华盛顿(特区)

的确，资料甚至暗示有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全球态度的可能性，而且相对地表明几乎没有支持为资本主义或为自由的民主政治而进军的倾向(据1975年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研究报告，公众和领袖人物都把输出资本主义或输出自由的民主政治列为所提出的十八项目标的最末一项)。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将来的看法却很混乱，对于应该遵循的具体政策的看法很不明确。从调查中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但是能够积极适应的舆论，它强调需要有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有能力确定人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必须遵循的方针，对于这些方针，公众可能随后作出积极的响应。

但是在缺少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时候，仍然存在着动摇不定变成决定性倾向的现实危险。这种倾向可能与几年前作出的某些中肯而引人注目的预言相符，这些预言指出美国公众在对外事务方面态度的循环性质。这些研究报告中的第一篇是由俄国经济史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蒂夫写的，它指出了美国衰退的循环模式——这一重要推论往往被那些提到康德拉蒂夫循环学说的人所忽视——并指出了与此相关的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变动的现象。康德拉蒂夫利用关于工资、价格、利率以及资本流量的资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升降趋势的一种规律性，根据这种规律性，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就预言说，七十年代将目睹一个通货膨胀的高峰，随后是长期下降的“波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和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将显著加强。

一位更直接地专门研究美国对国际事务态度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五十年代得出了与此明显相似的结论。弗兰克·L·克林伯格，系统地整理了涉及对外事务的资料——总统的咨文、政党的纲领、选举结果、历次签订的对外条约、海军经费、武装远征、战争、并吞、外交警告——后，论证了自1776年以来，美国同

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以“外向”和“内向”的交替循环为特征的①。由于外向的每一阶段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克林伯格用非凡的预见推断说：“考虑到美国过去的历史，并考虑到内部因素在促进内向—外向循环方面那种假定的作用，预料美国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么多地卷入世界事务的情况中退出来，而且也许在六十年代某一个时候就会这样做，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一种现实的、长期的趋势在起作用的可能性，加强着而不是减弱着美国领导层作出反应的中心地位，并且促成了一些旨在利用美国对世界事务不抱幻想的更加危险的呼吁。当代美国人的态度中有对外国人畏惧和憎恨的内在因素——不过也有作出建设性反应的可能性。美国的结局可能是强大的，但也可能因缺乏意志而无能为力，如果把强大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所需要的领袖人物不能出现的话。

美国责无旁贷

这种领袖人物不能产生，不仅对于美国可能是灾难性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更是如此。在急剧变化着的世界中，一个自我孤立的美国要能够保持它自己的内部平衡，它自己的社会准则，以及最后也许还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是很可怀疑的(特别是在通讯和经济两方面同时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内部的两极分化和种种忧惧可能造成严重的紧张状态，最后从内部破坏渴望成为保垒的美国的精神实质和政治恢复力。

但是，美国前后一贯地和积极地行动的能力，受到了美国同

① 弗兰克·L·克林伯格，“美国对外政策基调的历史性交替”，见《世界政治》，1952年1月。

变动中的世界的关系的自相矛盾的性质的限制。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当中，世界在社会方面处于一种美国化的过程，虽然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方面似乎正在经历着一种欧洲化的过程。尽管美国是通过它的工艺技术和大众文化以新的形式对世界其余部分产生影响的，但美国的政治在理论方面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分歧，一致性更少，而空谈则更多，因而使欧洲旧时的右派和左派的某些斗争又在美国土壤上复活。全球的美国化和美国的欧洲化造成了一种特别捉摸不定的混乱状态，使美国不能积极地运用它独一无二的全球性的影响。

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总的看来，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是主要的；因为美国的基本任务，尽管某些政策具有特定的目的，仍是同全世界有关系的。一个内向的美国——对其周围世界的险恶感到厌恶并为国内意识形态的斗争所困扰——将会造成一种真空，这种真空不是任何一种单独的力量所能填补的，虽然在某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结果，但更简单地说将由逐步升级的混乱来填补。

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应低估的。尽管它有缺点，美国仍然是世界性的有创造力的和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它对其他一些社会的生活方式、道德和愿望的影响程度，不是今天任何其他制度所能匹敌的。在学术界就是如此，因为美国不仅已经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且已经成为对外国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磁石，同样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①；最近以来，在艺术界也有这种

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世界上对美国的政策有很多批评，美国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一直继续增长。根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协会的资料，1960年美国有四万八千名外国学生和另外有作为移民前来的二千名外国学生；1965年，数字分别为八万二千和六千；1970年为十一万四千和二万；1975年为十五万五千和六万五千。与此相比，苏联1970年的数字只有一万七千五百。实际上，在每四名外国学生里，大约有一名总是挑选美国。

情况，因为纽约市已经成为多种艺术的世界中心；就近代管理技术来说，也完全是这样，因为美国的商业学校和管理顾问公司倡导着新的技艺；在妇女解放运动、生态学运动以及甚至在新左翼方面，情况肯定也是这样；在公共娱乐和文化方面更是如此，因为美国音乐、粗斜纹布裤和社会习惯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的模式。

当美国跃进到前所未有的电子技术时代，日益受到电子学和工艺学的支配（“电子技术”这个新名词由此而来），甚至连它的一些缺点也变得有更广泛的意义了。无论是吸毒文化或者在形成比较和睦的种族关系方面的种种挫折，或者是心理上过分放纵的问题，美国的一些反面教训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并且为其他国家所密切注视。简言之，当代美国是世界的社会实验室。它的纷扰，它的一些新思想，它的一些实验，既提供了刺激因素又提供了警告信号。

此外，美国的总的影响就是促进变革。的确，这里面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即美国的政策目的似乎倾向于反对变革，而美国的政治—社会的广泛影响却一直是反对传统和反对独裁主义的。一般地说，美国的社会影响以及至少也是由此派生的政治影响，一直是鼓励更多的社会实验，制度上更多的灵活性，更加乐意支持而不是反对同传统破裂。一个内向的美国就会逐渐停止执行那种任务。

美国的力量对于维护全球的稳定和进步仍然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欧洲和日本不能出面承担较为重要的政治责任，表明了美国战后政策遭到重大的和连续的挫折。要是这些国家更加积极地和建设性地参予处理全球性的问题，美国所受到的压力和美国的责任本来会大大减轻，而且在更有效地遏制苏联的情况下谋求东西方和解的希望也会大大增加。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中，不论是欧洲或者日本都不适宜于起一种比较重要的

作用——不论是对于传统的或者对于新的全球性问题。(前日本外相、出席1975年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特别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木村俊夫十分直截了当地说，他对于不得不以日本政府名义所作的声明的"笼统和抽象"的性质感到羞愧。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是提出为走向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而进行改革的详细建议的唯一的先进国家。)大家认为，法国在1974年到1975年确曾及时地提出过一些程序性的倡议，特别是发起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的所谓"三方商品协商会议"，但是这些会议的成就也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反应。

此外，先进的工业社会所遭受的经济混乱，特别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强行要求提高油价而引起的混乱，突出了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使美国处于比过去大约二十年中更关键性的地位。而且，尽管世界上有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对于十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正在消费世界三分之一的不能重复地使用的资源的情况抱有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全世界同美国的繁荣和更高的产量(因而消费也更多)有利害关系，这就使越来越多的政府在1975年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从不断的衰退中加速恢复它的经济。再没有比这些要求美国有更高增长率的呼吁更能说明美国处于全球经济福利的中心地位了。

更概括地说，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影响全局的作用，已经变成了主要稳定器的作用。在粮食方面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美国已经表明它是使全球营养品供应保持稳定的主要来源；不过它在贸易、货币事务和地区安全方面也一向显然如此。当美国发生波动的时候，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平衡就不稳定——这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大萧条》一书中从这些角度明确地吸取的一种教训，甚至可以说这对当前的情

况更加适用。引述伯格斯顿和克劳斯的《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一书中的罗伯特·吉尔平的一段话，就更重要了：

美国经济的规模、多样性和动力，将继续使美国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进入美国庞大市场的普遍愿望，美国经济在工艺方面固有的推动力，以及美国另外在农业和资源两方面的实力——欧洲和日本都没有这种实力——提供了一种足以使世界经济联结起来并使美国保持其中心地位的结合剂。

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也有同样的情况，在欧洲、中东和远东尤其如此。

一个不再表明建设性方向的美国，将因此直接助长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严重混乱。

最后，美国的有广泛历史意义的教训，如果不用一些辞句把它教条化的话，仍然会保持它的大部分正确性，而这种教条化的辞句只能造成美国的孤立。美国经验中的基本教训是把自由放在首要地位。但多元论居中心地位也是它的基本内容。个人自由在一个多元论的社会里得到了最好的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多元论意味着多样性而不是走向单一意识形态模式为基础的整齐划一的世界。由于出现了大约一百五十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不仅使这个教训保持着它的正确性而且已显得格外正确了。此外，如果把这一教训同一些为全球合作而提出的比较具体的建议联系起来，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更多样化的国际体系的有关概念的出发点。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这样一个美国：它任凭全球性的平均主义情绪正在增长，并且恰恰因为这种情绪在增长，而以合作的态度参与新的全球关系的建立。美国人不应忘记，外部的敌对态度并没有发展到针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地步。这种敌对主要是信

条方面的而不是民族的敌对，而且即使如此也仍然不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美国仍然具备着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条件(即使不是榜样的话)，而这种条件始终是美国特有的力量。苏联在这方面甚至还不是一个对手。但是，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情而敏感地对待全世界着重点的重要变化的时候，这种力量才能运用，而全世界的着重点正转变到这样一种准则，它对美国的经验来说从来不是很重要的。这并不一定要美国把平均主义作为最高美德接受过来，也不需要人为地把它应用到情况不同的、仍然是更开放的、人口不那么拥挤的而且肯定是更富裕的美国社会。但是它确实意味着要采取一种政策，即不忽视全世界要求改革现有国际安排的压力(也不与敌对的学说搞互惠)。把世界的复杂性和把正在出现的世界的当务之急归结为民主(或自由)对专制(或国家统治主义)这样一种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就是割断美国与世界在自由主义方面的联系，就是给国外的激进情绪火上加油，就是促使美国在哲学上从而也在政治上孤立。

最后，这些范围广泛的考虑，还有更直接的用处。在进行中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美国有机会来制定一项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这就需要把上面论述过的一些哲学内容和政治现实更充分地加以考虑，这是迄今为止欧洲人以及甚至日本人看来更愿意采取的一种立场。此外，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美国可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若干地方面临很难解决的危机。东欧也可能有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可能支配美国对这些问题态度的一些基本前提，也许会非常直接地影响美国以下述方式作出反应的基本能力：即既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又使美国能够把大多数人类的同情和支持聚集到自己周围。

当种族平等开始被全世界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准则的时候，

对美国来说，再没有比使自己处于非洲白种优越论残余的最后庇护者的地位更有害了。这样做将使整个非洲和亚非的大部分团结起来反对我们。同样，美国的长远利益，将由于继续漠视中部美洲日益增长的要求更多的社会正义和国家尊严的愿望而受到损害，因为我们的漠视只能使卡斯特罗的古巴更容易利用这种愿望。由于漠视而产生的任何纠纷，可能引起大部分拉丁美洲的反抗。最后，如果美国对于苏联同那些企图扩大或保护本国独立的东欧国家的关系抱漠不关心的观点的话，美国就是对自己首创的社会准则不忠实。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结果，对于美国在整个欧洲而且甚至在中国的利益将是有害的。

最重要的是，必须牢记，毕竟只有美国才有力量为自己塑造一个敌对的世界。

（摘译自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76 年夏季号）

